

THE **SOROS** LECTURES

超越金融 | 索罗斯的哲学

[美] 乔治·索罗斯◎著 宋嘉◎译

索罗斯一生经验的浓缩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THE **SOROS** LECTURES

超越金融 索罗斯的哲学

[美] 乔治·索罗斯◎著
宋 嘉◎译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前 言

2009年10月，我在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发表了一个系列讲座。中欧大学是一所致力于人文和社会科学方面的国际研究生院，是我于1991年苏联体系解体后创建的。

第一讲和第二讲总结了我一生的经历和反思，详细阐明了指导我从事商业经营和公益慈善事业的理念架构，以及如何运用它对当前动荡的金融市场进行解释和分析。第三讲和第四讲涉及的是对我来说较新的领域，即有关道德价值观和政治权力，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最后一讲，是在我的理念架构许可的范围内提出的预测和对策。

我对我的目标满怀热望，即这个理念架构可为更好地理解人类事务提供基础。读者们可以评判我做得是否成功。我的这些看法是以批判性的思维提出的，希望人们也以同样批判性的思维来对待，而不是把它当成某种武断的教条。

这个系列讲座及随后的讨论，用会议视频的方式播放给了世界各地的大学。其录像可在开放社会的网站上看到，网址是：
www.soros.org/resources/multimedia/sorosceu_20091112。

讨论的合作者之一是上海复旦大学，另一个合作者是香港大

超越金融 | THE SOROS LECTURES

学。我对此感到非常欣慰，因为我相信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在日益增长，如果我的理念架构能在中国找到一批追随者，世界可能会变得更美好。其他讨论合作者包括哥伦比亚大学、我的母校伦敦经济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我非常高兴能在这些著名的学府中分享我的理念。

我在此对中欧大学、开放社会研究所和我的工作人员致谢，感谢他们为五个讲座和视频传播的成功作出的努力，并对我的出版商彼得·奥斯诺斯及其公共事务出版社（PublicAffairs）的同事表示感谢。需要感谢的人还包括：科林·麦金和马克·诺图尔诺，他们协助我弄清了某些哲学观点；中欧大学校长约翰·沙特克；在讲座后主持讨论的阿诺托利·卡莱茨基、伊万·克拉斯蒂夫、马克·丹纳和霍华德·戴维斯。另外，我要对克里斯顿范姆·布阿尔克及其他作出评论的人表示感谢。

乔治·索罗斯

2010年1月于纽约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超越金融：索罗斯的哲学/ (美) 索罗斯 (Soros, G.) 著；宋嘉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4

书名原文：THE SOROS LECTURES

ISBN 978-7-5086-1888-3

I. 超… II. ①索…②宋… III. 金融投资—经验—美国 IV. F837.12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05954 号

THE SOROS LECTURES: At the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by George Soros

Copyright © 2010 by George Soro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China CITIC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ublicAffairs, a Member of Perseus Books Group
through Bardonia - 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超越金融：索罗斯的哲学

CHAOYUE JINRONG: SUOLUOSI DE ZHEXUE

著 者：[美] 乔治·索罗斯

译 者：宋 嘉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 35 号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开 本：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6.25 字 数：86 千字

版 次：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09-7903

书 号：ISBN 978-7-5086-1888-3/F·1884

定 价：2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010-84264000

<http://www.publish.citic.com>

服务传真：010-84264033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目录

contents

前言

第一讲 人的不确定性原则 1

第二讲 金融市场 19

第三讲 开放社会 35

第四讲 资本主义与开放社会 51

第五讲 未来的路 67

目录 contents

Author's Note 85

Lecture One The Human Uncertainty Principle 87

Lecture Two Financial Markets 109

Lecture Three Open Society 131

Lecture Four Capitalism Versus Open Society 153

Lecture Five The Way Ahead 173

第一讲

人的不确定性原则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我在人生历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理念架构（conceptual framework），它既帮助我经营对冲基金去赚钱，又使我作为一名以政策为导向的慈善家去用钱。但是这个理念架构本身不是关于钱的，而是关于一个哲学家们早已深入研究过的主题，即思维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我对这一哲学命题的研究，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时开始的。我提前一年完成了毕业考试，所以在拿到学位之前有一年的自由时间。我可以自己选导师，于是选了出生于维也纳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他的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对我影响甚深。

波普尔在书中论述，经验性的真理不可能是绝对确定的。即使是科学原理，也不能毫无疑问地被证实：只能通过检验来证伪。即一个失败的检验就足以证伪，而再多的确认性例证也不能完全证实。科学原理具有假设条件，其真实性要能经受证伪的检验。声称掌握绝对真理的意识形态是一种错误的宣称，所以只能强加于社会。所有这类意识形态都会导致压抑。而波普尔提出了一个更有吸引力的社会组织形式：开放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可以自由地持有不同的见解，法律允许观点不同和利益各异的

人们和平地生活在一起。因为我在德国和苏联占领下的匈牙利这块土地上生活过，所以开放社会的理念对我有极大的吸引力。

我在读波普尔的著作时也研究经济学理论。波普尔强调人的认知的不完美，经济学中的完美竞争理论则假定存在完美的认知。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触动了我，使我开始对经济学理论的假设前提产生质疑。这是激发我进行哲学思考的两个主要的理论因素，当然还有其他许多次要的方面。

我的哲学理念的形成也深受我个人经历的影响。我的个性形成时期是1944年德国占领匈牙利时，那时我还不到14岁。我来自经济状况尚可的中产阶级家庭，突然之间，只因为我是犹太人就要面对被驱逐和被杀害的可能。幸亏我父亲对这一动荡早有准备。他经过了俄国革命，那是他的个性形成时期。在俄国革命之前，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自愿参加了奥匈帝国军队，结果被俄国人俘虏，作为战俘被送到西伯利亚。因为有抱负，他成了战俘们自办报纸的编辑。报纸是手抄的，贴在一块木板上，叫“木板报”。这使他很有威信，被选为战俘的代表。后来附近一个集中营的一些战俘逃跑，他们的代表被枪毙作为惩戒。我父亲没有坐等同样的事在他的集中营发生，而是组织领导了一个越狱小组。他们计划做一个木筏，顺着河道漂往大海。但是他的地理知识不够，不知道在西伯利亚地区所有的河都流向北冰洋。他们漂泊了几个星期才发现是朝着北极漂流，后来又用了几个月才穿过针叶林带回到文明世界。这时俄国革命爆发，他们又被卷入。历经艰难险阻，我父亲最后终于回到匈牙利。其实，如果当初他留在集中营可能早就回家了。

父亲回家后完全变了一个人，在俄国革命中的经历深深影响

第一讲 人的不确定性原则

了他。他失去了雄心抱负，只希望享受人生，别无他求。他传递给孩子们的价值观与我们生活的那个年代完全脱节。他没有积累财富或在社会上成名的愿望。相反，他只求能养家过日子即可。我还记得被父亲派到他的一个主要客户那里借钱，好去滑雪度假。回来后他牢骚满腹了好几个星期，因为得多工作来还债。所以尽管我们家境不错，但不是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而且我们以与众不同为荣。

1944 年德国占领匈牙利时，我父亲立刻意识到这是非常时期，通常的规则不再适用了。他为家人和其他一些人准备了假身份证，有钱的付了钱，没钱的他免费帮忙。他们大多数都幸存下来。这是我父亲一生中最自豪的事。以虚假身份生活的经历，对我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我们随时有生命危险，周围的人不断消失，而我们不但幸存下来，还可以帮助别人。我们很幸运，战胜了许多难以想象的艰险。这令我感到自己很独特，我们的经历太惊险了。父亲是我可靠的向导，我们安然无恙地过来了。一个 14 岁的孩子还能奢望什么呢？

有了在纳粹魔爪下逃生的惊心动魄的经历之后，在苏联占领下的匈牙利生活开始变得乏味。我在寻找新的挑战，并且在父亲的帮助下成功地离开匈牙利，17 岁时到了伦敦去上学。我学习的主要兴趣，是想对我生长的这个奇怪的世界有所了解。但必须坦白，我也幻想成为一个大哲学家，我相信自己有与众不同的见解。

在伦敦的生活使我大失所望。我没有钱，很孤独，而且没人对我想说的话感兴趣。即使环境迫使我去做一些平庸的事，我也没有放弃自己在哲学上的抱负。学业结束后，我找的几个工作都

不对路，最后我终于在纽约做起了套汇交易，但业余时间还是继续我的哲学研究。

就这样我写了第一篇重要论文，题为“意识的重担”（*The Burden of Consciousness*）。论文试图按照波普尔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的框架，将有机社会与传统思维方式相对应，将封闭社会与教条式思维相对应，将开放社会与批判式思维相对应。我未能很好地解答的是，思维方式与现实情况之间相互关系的本质。这个问题继续吸引着我，促使我后来提出了反射的概念（*reflexivity*）。下面我会进行更详细的阐述。

恰恰是反射概念使我对金融市场有了比现行的主导理论更好的新认识。这给了我一种优势，先是作为证券分析师，后来作为对冲基金经理。我觉得自己掌握了一个新的重大发现，也许可以使我实现成为一个大哲学家的梦想。有一段时间生意受挫，我把全部精力投入了哲学理念的研究。但是我太看重这一发现而到了无法摆脱的地步。我感到反射概念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索。我钻得越来越深，以致迷失在自己复杂的思维之中。早上醒来时，我无法理解前一天晚上写的东西。这时我决定放弃哲学探索，集中精力赚钱。多年之后成了一个成功的对冲基金经理后，我才又回到我的哲学研究中。

我的第一本书《金融炼金术》（*The Alchemy of Finance*）是1987年出版的。在书中，我试图解释自己看待金融市场的内在哲学基础。对冲基金行业中的很多人都读过此书，商学院也将其作为教材，但是其中的哲学论述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这些论点被忽视，读者认为这不过是一个成功商人的自负，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哲学家而已。

第一讲 人的不确定性原则

我也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真的有一个新的重大发现。毕竟我所涉及的主题是众多哲学家自古以来就在研究的。我有什么理由认为自己有新的发现，尤其是别人并不这样认为？毫无疑问，这个理念架构对我个人来说十分有用，但其他人似乎并不像我一样觉得它有价值。我不得不接受他们的判断。我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哲学兴趣，而只将其作为个人爱好来对待。在我的生意和慈善事业中，我继续受这一理念架构的引导，而且慈善事业在我生活中占的位置越来越重要。我每写一本书都努力阐述我的观点。这有助于我拓展这一理念架构，但我仍然把自己看成一个失败的哲学家。有一次我讲座的题目就是“一个失败哲学家的又一次尝试”。

这一切都被 2008 年的金融危机改变了。我的理念架构使我既预见到了这场危机，又在它最终到来时有能力应对。它还使我比大多数其他人能更好地解释和预测事件的发展。这让我改变了我自己以及别人对此理念的评价。我的哲学理念已不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它应该被认真对待，也许有助于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正是这一点促使我来作这个系列讲座。

好，现在就开始。今天这一讲，我将大致介绍谬误性（fallibility）和反射性的基本内容。明天，我将用这些理念分析金融市场，然后用于分析政治问题。这也会涉及开放社会的理念。第四讲将探讨市场价值与道德价值的区别。第五讲对眼下面临的历史时刻给出一些预测及对策。

可以用两个相对简单的命题说明我的核心思想。一个是，在参与者有思维能力的前提下，参与者对世界的看法永远是局部的

和扭曲的。这就是“谬误性”。另一个是，这些扭曲的观点可以影响参与者所处的环境，因为错误的看法会导致错误的行为。这就是“反射”原理。比如，把吸毒成瘾者当罪犯对待，他们就会做出犯罪行为。因为这会导致对吸毒问题的错误理解，而妨碍对吸毒成瘾者的适当治疗。另一个例子，把政府看成坏政府则容易使政府变坏。

两个命题其实都是常识，所以当评论我的人说我讲的不过是显而易见的事，他们说对，但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对。我的命题的有趣之处，在于它们还没有被广泛认识接受。特别是反射概念被故意忽视，甚至被经济学理论否认，而经济学是最发达和最有影响力的一门社会学科。我的理念架构值得受到重视，不是因为它是一个新发现，而是因为像反射这样属于常识的概念，竟被如此故意忽视。认识反射性成了徒劳地追求人类事务确定性的牺牲品，尤其是在经济学领域，而不确定性恰恰是人类事务最关键的特性。经济学理论建立在均衡的概念上，它与反射概念直接冲突。我将在下一讲中说明，这两个概念如何导致了对金融市场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

对谬误性概念的争议要少得多。人们一般已经认识到，我们所在的世界的复杂性超过了我们的认知理解能力。在这方面我没有什么重大的新看法。主要的困难在于，参与者是他们所要解决的问题的一部分。面对现实的极端复杂性，人们不得不诉诸各种各样将事情简单化的做法：归纳法、二分法、象征手法、决策法则、道德戒律等。这些思维产物使情况进一步复杂化。

大脑的结构是造成认知扭曲的另一个因素。脑科学近期的发展对大脑功能开始有了新的见解，为大卫·休谟（David Hume）

第一讲 人的不确定性原则

关于“理性是激情的奴隶”这一有洞察力的论点提供了证据。一个与肉体相分离的理智或理性的想法不过是我们虚构的想象。大脑中充斥着千百万感官冲动，而意识只能同时处理七八个主题。这些冲动需要在巨大的时间压力下被压缩、整理和解释，不可避免地会发生错误和扭曲。脑科学为我最初的论点增添了很多新的细节，即我们对身处其中的世界的认知理解，是天生不完美和有缺陷的。

反射的概念需要进一步解释，它仅适用于有思维的参与者的情况。参与者的思维有两个功能：一个是理解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我称之为认知功能（cognitive function）；另一个是改变境况使之对我们有利，我称之为参与或操纵功能（participating or manipulative function）。这两个功能将思维与现实从相反的方向连接起来。从认知功能的角度看，现实应该决定参与者的看法；因果关系的导向是从世界到头脑。与此相反，在操纵功能中，因果导向是从头脑到世界，也就是说，参与者的意图应该决定和左右结果。当这两种功能同时运作时，它们可以相互干预。干预是怎样发生的呢？是通过使每一个功能都失去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而这是决定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的值所必需的：当一种功能的自变量成为另一种功能的因变量时，两个功能都没有了真正的自变量。

这意味着，认知功能不能提供足够的知识作为参与者决策的基础。同样，操纵功能可以对结果有影响，但不能决定结果是什么。换言之，结果有可能偏离参与者的意图。在意图和行动之间肯定会有偏离，行动和结果之间又会有进一步的偏离。这样，就

使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和事件的实际发展过程都有了不确定的因素。

为了更好地理解与反射性有关的不确定性，我们需要对每个功能再加以审视。如果认知功能可以不受操纵功能的干扰而独立运作，则可以产生知识，它表现为真命题（true statement）。真理符合论的观点（correspondence theory of truth）告诉我们，一个表述如果符合事实就是真实的。但如果受到操纵功能的干扰，这些事实就不能再被作为独立的标准来判断一个表述的真实性，因为改变事实的表述可能已产生了一定的对应性（correspondence）。

看一下这个表述，“天在下雨”。表述正确或错误取决于是否真的在下雨这一事实。再看一下另一个表述，“这是一种革命的形势”。这个表述就是反射性的，其真值取决于它所造成的影响。

反射性表述与说谎者自相矛盾的话有些相似，是一个自我参照（self-reference）的表述。自我参照已被大量分析过，而人们对反射性的注意却很少。这很奇怪，因为反射性对真实世界有影响，而自我参照只是一个单纯的语言学现象。

在现实世界中，参与者的思维不仅表现为陈述，也表现为各种形式的行为举止。这使反射性成了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其典型的表现形式是反馈环（feedback loops）。参与者的看法影响事件的发展，事件的发展又对参与者的看法产生影响。影响是连续的和循环的，形成环状。这一过程可从两者中的任何一个方向启动，可以从看法的变化开始，或从事件的变化开始。

反射性的反馈环尚未被严格地分析过，当我最初发现反射性并试图对其进行分析时，遇到了种种复杂情况。反馈环应该是参与者的看法和事件的实际发展之间的双向联系。但是参与者们的看法之间又是如何双向联系的呢？或者是一个单独的个体，问自

第一讲 人的不确定性原则

己是什么样的人，主张什么，并经过反思改变了自己的行为，这种情况下的双向联系又是什么呢？

为了避免我早期对反射性进行探讨时的陷阱，我建议对现实的客观性和主观性加以区分。思维属于主观层面，事件属于客观层面。换言之，主观的一面是指参与者的头脑中发生了什么，客观的一面是指外部的现实发生了什么。外部的现实只有一个，而主观的看法却会有许多。反射性可以将现实中的任何两个或多个方面联系起来，在它们之间形成双向反馈环。在特殊情况下，双向反馈环甚至可以发生在现实的某个单一方面，例如一个单独的个体进行自我反思的情况，也许可以表述为自我反射性（self-reflexivity）。这样我们可以区分两大类：反射性关系，它将现实的主观层面相连接；反射性事件，属于客观层面。婚姻属于反射性关系，2008年的崩溃是反射性事件。当现实没有主观的一面时，也就没有了反射性。

反馈环可以是负面的或者正面的。负反馈使参与者的看法与实际情况更接近，正反馈使两者背道而驰。换言之，负反馈的过程是自我纠正（self-correcting）的过程。它可以永远地进行下去，而且如果没有外部现实的重大变化，它可能最终达到均衡（equilibrium），这时参与者的看法符合事物的实际情况。这正是金融市场应该发生的现象。因此作为经济学核心理论的均衡，是负反馈的极端情况，即我的理念架构中有局限性的情况。

与此相反，正反馈是自我强化（self-reinforcing）的过程。它不可能无止境地继续下去，因为参与者的看法终将远离客观现实，而使参与者不得不承认其看法是不现实的。如果现实情况没

有变化，这一过程也不可能反复出现，因为正反馈的本性会强化现实世界中占主导的趋势，不论该趋势是什么。这样，我们得到的不是均衡，而是动态的不均衡，且会导致远非均衡的状况。通常在远非均衡的情况下，认识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会达到极点，因而向相反的方向启动正反馈的过程。这种起初是自我强化，最终成为自我毁灭的繁荣—衰退周期，或是泡沫，这正是金融市场的特性，但这种现象在其他领域里也可以发现。我称其为易扩散谬误（fertile fallacies），即对现实的解释是扭曲的，而其产生的结果又强化了这种扭曲。

我知道我讲的这些可能非常抽象，很难懂。一些具体的例子可能会有助于理解，但请你们耐心听我讲下去。我的看法完全不同，而且抽象的论点难以理解这一事实对我会有所帮助。谈论像现实或者思维，或两者之间的关系这类抽象的概念很容易引起混乱和造成错误的看法，而错误的看法在人类的活动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最近的金融危机，就可以归结为对金融市场如何运作的错误认识。这是我下一讲的主题。在第三讲里我会讨论两个易扩散谬误——启蒙期谬误和后现代谬误，以及这两种谬误对我们世界观的普遍深入的影响。具体的事例可以说明错误的认识在历史进程中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但是在这一讲的后半部分，我还是要站在抽象的高度上。

我认为，包括有思维的参与者的情况与自然现象的构成不同，不同之处在于思维的作用。在自然现象里，思维不起因果的作用，而仅仅是认知功能。在人类活动中，思维是论及的主题的

第一讲 人的不确定性原则

一部分，既有认知功能又有操纵功能。这两种功能可以相互干预，但相互干预不是总在发生。在日常生活中，比如开车或刷房子，这两种功能实际上是互补的。但是当相互干预发生时，就产生了一个自然现象中没有的不确定因素。这种不确定性在两种功能上都有所表现：参与者的认知有缺陷，而且其行为的结果不符合其预期。这是人类活动的一个关键特性。

与此相反，在自然现象中，情况的发展不受观察者的观点的影响，旁观者只是以认知的功能参与。这样，自然现象就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标准，可以根据它来判断观察者理论的真实性。旁观者可以因此获得认知，并在这一认知的基础上成功地操纵自然。在此，认知功能和操纵功能自然地分割开。由于这种分割，两种功能都可以比在人类环境中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讲到这里我想强调一下，反射性不是人类事务中不确定性的唯一来源。反射性的确给参与者的看法和事情的发展都带来了不确定因素，但是还有其他因素也可能产生同样的效果。举例来说，一些参与者无法知道其他参与者所知道的情况，这不同于反射性，但也是人类事务不确定性的一个根源。还有，不同的参与者有不同的利益，有些利益可能是相互冲突的，这是不确定性的另一个根源。再者，各个参与者可能有多元的且互不一致的价值取向。这些因素造成的不确定性，很可能比反射性引起的不确定性范围更广。我把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称之为“人的不确定性原则”（human uncertainty principle），这是一个比反射性更宽泛的概念。

人的不确定性原则，比渗透于笛卡儿哲学中的主观怀疑主义（subjective skepticism）要严谨得多。这一原则使我们有客观的理

由相信，我们的感性认识和预期是，或者至少可能是错误的。

尽管人的不确定性最初影响的是参与者本身，但它对社会科学的意义要深远得多。我所能解释的最好的办法是引用波普尔的科学方法论。这是一个极简明而合理的设计，包括三个要素和三项运作。三个要素是：科学原理，以及运用这些原理的初始条件和最终条件。三项运作是：预测、解释和验证。当科学原理与初始条件相结合时，就产生预测。当原理与最终条件相结合时，则产生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讲，预测和解释是对称的和可逆的。剩下的是验证，即将预测与实际结果进行比较。

根据波普尔的理论，科学原理是假设性的，不能被证实，但可以通过检验被证伪。这一科学方法成功的关键，是它可借助独特的观察，检验结论的普遍有效性。一个失败的验证即足以证伪，但是不论多少肯定的例子都不足以证实。

这对科学如何既是经验主义的又是理性的这一难题，提出了有效的解决办法。根据波普尔的方法，科学是经验主义的，因为我们通过观察预测断言是否真实，对我们的理论进行检验；它又是理性的，因为我们观察时使用的是归纳逻辑法。波普尔放弃了归纳逻辑，改为依靠检验。他认为，未被证伪的概括性结论未必就是科学的。波普尔强调检验在科学方法中的核心作用，并宣称科学原理仅是暂时有效，可以重新检验，从而为批判性思维提供了强有力的范例。因此，波普尔模式的三个显著特征是：预测与解释之间是对称的，证实和证伪之间是不对称的，而位于中心的是检验。检验使科学发展、改进和创新。

波普尔的模式在对自然现象的研究上运用得很好，但是人的

第一讲 人的不确定性原则

不确定性破坏了该模式的简明和合理。预测中的不确定因素破坏了它与解释之间的对称，而且使检验的核心作用受到威胁。初始条件和最终条件是应该包括还是应该剔除参与者的思维？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检验要求这些条件能够重复。如果将参与者的思维包括进来，则很难观察初始条件和最终条件，因为参与者的看法只能从他们的表述或行动中推断。如果不包括，初始条件和最终条件则无法形成独特的观察，因为同样的客观情况可以与许多看法非常不同的参与者相关联。这两种情况都无法对普遍有效性作适当的检验。这些困难不能阻止社会学家提出有价值的概括（generalization），但概括很可能无法达到波普尔模式的要求，也无法与物理学定律的预断力相比。

社会科学家们感到很难接受这一结论。经济学家尤其会感受到弗洛伊德称为“物理羡慕”（physics envy）的苦恼。

曾经有人试图通过创造或假定参与者的思维与实际情况之间的某种固定关系，来消除人的不确定性原则引起的困难。马克思说过，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是由生产的物质条件决定的；弗洛伊德则认为，人的行为是由人们甚至尚未意识到的驱动力和情结决定的。尽管如波普尔指出的，它们不能通过检验被证明是否是错误的，但两者均断言其理论的科学性。

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尝试是经济学的理论。它从一开始就假设认知是完美的，当这个假设站不住脚时，又有越来越多的扭曲观点来维护行为是理性的这一谎言。其结果使经济学得出了一种理性预期的理论，认为人们对未来有一种单一的最好的看法，这一看法符合未来的情况，而且最终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将围绕这个

观点会集到一起。这一假定是荒谬的，但又是人们所需要的，以便使经济学理论能有如同牛顿物理学定律那样的模式。

有趣的是，波普尔和哈耶克在《经济学》(*Economica*)杂志中都表示，社会科学不能得出像物理学那样的结果。哈耶克猛烈抨击了机械地、不加鉴别地适用自然科学的定量方法。他称之为科学主义。波普尔在其撰写的《历史主义的贫困》一文中阐明，历史不能由普遍适用的科学规律来决定。

尽管如此，波普尔还是提出了他的“统一方法论”(doctrine of the unity of method)，他认为，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判断应使用同样的标准。哈耶克则成了芝加哥经济学派的鼓吹者，那里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发源地。但在我看来，人的不确定性的含义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的主题根本不同，因此需要采用不同的方法，而且必须用不同的标准来衡量。人们不应期望用经济学的理论找出普遍适用的规律，并可以反过来被用于解释和预测历史事件。我的论点是，盲目地模仿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对人和现象的曲解。社会科学通过模仿自然科学所得到的结果，无法与物理学相比。

我对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划分如此分明的界限有些顾虑。这种极端的二元性一般在现实中找不到，是我们为了大致搞清楚非常容易混淆的现实而提出来的。的确是，当有理由在物理学和社会科学之间作出鲜明的区分时，有一些其他学科，如生物学和研究动物世界的学科，则处于两者之间。

但是我不得不放下顾虑而承认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二元性，因为社会科学还有第二重困难，即除了自然科学所没有的人

第一讲 人的不确定性原则

的不确定性外，社会理论本身还具有反射性。

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发现的不确定性原则对量子粒子的行为没有丝毫影响；但是社会科学，不论是马克思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还是反射理论，对其涉及的主体都有所影响。也就是说，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则对科学的方法没有干扰，而社会科学的反射理论对科学的方法有干扰。当社会科学可以被用来积极改变事物的状况时，为什么要把社会科学消极地局限在社会现象的研究上？正如我在《金融炼金术》一书中指出的，炼金者们犯了一个错误，他们试图用咒语改变原金属的性质；而他们应该做的，是将注意力集中在能够成功的金融市场上。

社会科学怎样才能被保护而不受这种干扰？我建议使用一个简单的对策：承认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二元性。这可确保社会学理论以自己的价值被判断，而不是错误地与自然科学进行类比而被评判。我提议将其作为保护科学方法的一种常规做法，而不是要贬低社会科学。这一常规做法对社会科学可能获得的成就设任何限制，相反，可将社会科学从盲目模仿自然科学中解放出来，并保护它不受错误标准的评判，以此打开新的前景。正是以这种精神，下一讲我将提出我对金融市场的解释。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第二讲

金 融 市 场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在这一讲中，我将把第一讲中介绍的几个概念，谬误性、反射性和人的不确定性原则，运用于金融市场。请打起精神作好准备，我要把一生的经验浓缩在这一讲里。

金融市场是检验我在上一讲里阐述的抽象理念的一个极好的实验室。事物的发展过程在这里比其他大多数领域更容易观察。许多事实是定量的，数据也得到很好的记录和保存。检验的机会在于，我对金融市场的解释与有效市场假说直接冲突，而这一假说是迄今金融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理论。这一假说宣称，市场趋于均衡，偏离会随时发生，而且可归因于外来的冲击。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那我的就是错误的，反之也一样。

我先讲一下将我的理念架构运用于金融市场的两个基本原则。第一，市场价格总是扭曲其背后的基本面。扭曲的程度可能微不足道，也可能十分严重。这与有效市场假说针锋相对，有效市场假说认为市场价格准确地反映所有存在的信息。

第二，金融市场不会单纯消极地反映内在现实，它也有积极的作用：能够影响其所应该反映的所谓基本面。行为经济学忽略

了这一点。它只注重反射过程的一半，即金融资产的错误定价，而没有论及错误定价对基本面的影响。

金融资产的错误定价对所谓基本面的影响可以有若干途径，其中最常见的是杠杆的使用，包括债务杠杆和资产杠杆。各种反馈环会给人以市场经常是正确的印象，但是这种机制的运作与流行范式的机制很不相同。我认为，金融市场有办法改变基本面，改变的结果可能使市场价格与内在基本面更相符。这与宣称市场总是准确地反映现实，并自动趋于均衡的有效市场假说形成了鲜明对比。

我的这两个论点集中说明了金融场所具有的反射性反馈环特征。我在第一讲中描述了两种反馈，负反馈和正反馈。负反馈是自我纠正，正反馈是自我强化。这样，负反馈可引发导向均衡的趋势，而正反馈可造成动态的不均衡。正反馈环更有意思，因为它可以使市场价格和内在基本面上都发生大的变动。一个完整运转的正反馈环起初是向某一方向自我强化，但最终会达到极点或逆转点，此后则向相反的方向自我强化。但是正反馈的过程不一定能走完，在任何时刻都可能被负反馈终止。

我根据这个思路研究出了关于繁荣—衰退过程或称泡沫的理论。每个泡沫都有两个组成部分：现实中主导的潜在趋势，和对这个趋势的错误理解。当趋势与错误理解积极地彼此强化时，就引发了繁荣—衰退的过程。这一过程会在发展中受到负反馈的检验。如果趋势足够强大，能经得起检验，趋势和错误观念则会进一步相互强化。最终，市场预期变得与现实相差太远，致使人们被迫承认错误观念的存在。随之而来的是黄昏期，怀疑增长，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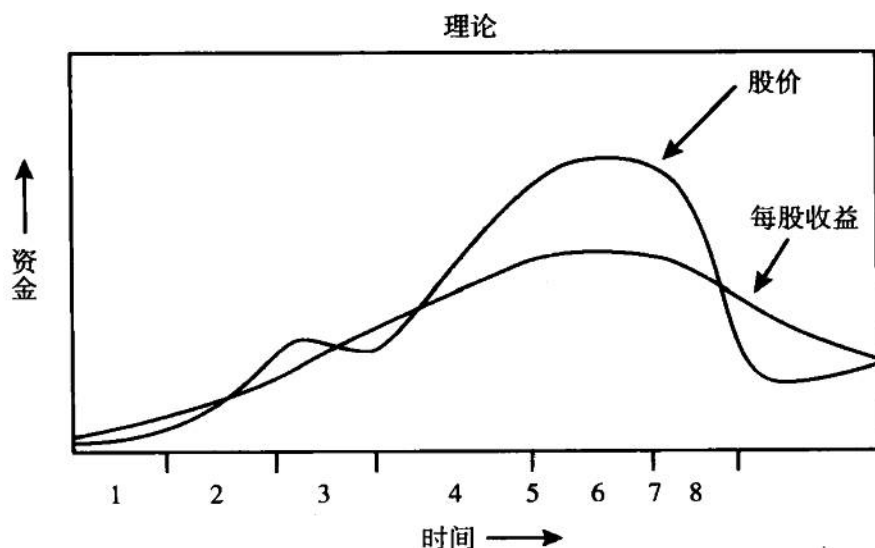
多的人失去信心，但是主导的趋势由于惰性仍在维持。像花旗集团前首席执行官查克·普林斯（Chuck Prince）说的：“只要还有音乐，就要起来跳舞。我们还在继续跳。”最后终于到了趋势的逆转点，然后它开始朝相反的方向自我强化。

现在再讲一下 1987 年我最初提出这个理论时举过的例子，即 20 世纪 60 年代末大型企业集团的繁荣：潜在趋势的标志是每股收益，与此趋势相关的预期表现为股票价格。企业集团通过收购其他公司提高自己的每股收益。预期膨胀提高了它们的收益水平，但最终现实无法跟上预期。经过一段黄昏期后，价格趋势出现逆转，所有过去被掩盖的问题都暴露出来，收益崩溃。当时，一个企业集团奥格登公司（Ogden Corporation）的总裁告诉我：没人再看我的演出了。

下图是企业集团泡沫的模型。像奥格登这样的企业集团的图与此很相似。遵循这一模式的泡沫现象会经过几个明显的阶段：（1）发端期；（2）加速期；（3）被成功的检验中断又进一步强化；（4）黄昏期；（5）逆转点或巅峰；（6）加速下跌；（7）形成金融危机。

每一个阶段的长短及强度很难预测，但是顺序有内在的逻辑。所以每阶段的顺序可以预测，但顺序也可能由于政府的干预或其他形式的负反馈而终止。在企业集团兴起的案例中，租赁系统与研究公司（Leasco Systems and Research Corporation）企图购买汉华信托公司（Manufacturer Hanover Trust Company）的失败，形成了巅峰，或逆转点。

泡沫现象具有典型的形状不对称性。上涨拉的时间很长，起始较慢，逐渐加速，直到黄昏期拉平；下跌则很短很陡，因为它



是被强迫清算所强化的。幻灭引起恐慌，使之达到金融危机的巅峰。

最简单的例子是房地产的繁荣。使趋势猛涨的因素是信贷便宜和容易取得；使趋势成为泡沫现象的错误观念是，附属担保物的价值不受信贷量的限制。而实际上，信贷量与附属担保物价值之间是反射的关系。信贷较便宜又较容易得到时，交易活跃，房地产价值上升，拖欠欠付情况较少，信贷表现良好，借贷标准宽松。这样在上涨高潮时，信贷量达到极限；其逆转则造成强迫清算，房地产跌价。

然而，错误的观念以各种其他形式继续出现。1982 年的国际银行业危机是围绕主权债务引起的，它没有附属担保物。主权国家借债者的资信度是由各种债务比率衡量的，如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或债务服务与出口的比率等。这些比率被视为客观标准，而实际上它们是反射相关的。20 世纪 70 年代石油美元

第二讲 金融市场

的回收，增加了对巴西等国家的信贷注入，它们的负债比率提高，促使进一步的注入，从而开始形成泡沫。在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尔提高利率以遏制通货膨胀后不久，泡沫就破裂了。

并非所有的泡沫都涉及信贷的扩大，有些是基于资产杠杆操作的。最好的例子当然是 20 世纪 90 年代末的互联网泡沫。当艾伦·格林斯潘 1996 年谈到非理性繁荣时，对泡沫现象作了错误的说明。人们看到泡沫形成时，冲入市场去买，火上浇油，并不是因为没有理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有监管者在泡沫面临变得太大的危险时去控制市场，因为不能指望市场参与者这样做，无论他们掌握多少信息或是多么有理智。

泡沫不是反射性的唯一表现形式，但恰恰能最明显和最直接地反击有效市场假说，所以的确值得特别注意。反射性还有其他许多表现形式。例如在货币市场上，上扬和下挫是对称的，所以没有繁荣和衰退之间不对称的迹象，但是也没有均衡的迹象。自由浮动的汇率趋于表现为大规模的多年波浪式运动。

最重要也最有趣的反射互动，发生在金融监管机构和金融市场之间。由于市场不趋于均衡，所以容易阶段性地产生危机。金融危机导致监管改革。中央银行和金融市场的监管法规就是这样产生和发展的。金融监管机构和市场参与者都在不全面的认识基础上运作，这使它们之间的互动形成了反射性关系。

虽然泡沫只是间歇性地形成，但监管机构和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持续进行的。任何一方的错误理解一般会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因为市场的反应会给监管机构提供有益的反馈，使其纠正

自己的错误。但有时，错误被证明为自我肯定，因而形成恶性循环或良性循环。这样的反馈环在某种程度上与泡沫现象相似，即最初是自我强化，最终成了自我毁灭。监管机构对阶段性金融危机的干预，在“超级泡沫”的发展中的确起了关键作用，这一泡沫在 2007 ~ 2008 年间破裂。

有一点很重要，应该认识到，即并不是所有的价格扭曲都是由反射性造成的。市场参与者不可能用知识来决策——他们必须预测未来，而未来如何取决于他们尚未作出的决定。那些决定是什么，其影响如何，不可能被准确地预见。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被迫要作出决定。想估计正确，需要知道所有其他参与者的决定及其后果，而这是不可能的。

理性预期理论试图回避这种不可能，它假定只有一种正确的预期，而且人们的看法会趋于以这一预期为中心。这种假定与现实不符，但却是目前大学里讲授的金融经济学的基础。实际上，参与者必须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作出决定。他们的决定肯定是临时性和有偏见的，这是价格扭曲的根本原因。

有时价格扭曲会引发繁荣—衰退的过程，但更经常的是它们会被负反馈所纠正。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波动是没有规律的。我将其比做在游泳池里溅起的水花和海里的波浪，显然后者更巨大，但前者更普遍。这两种价格的扭曲往往混合在一起，所以在实际的繁荣—衰退过程中很少完全遵循我的模式。按照我描述的模式发展的泡沫只在很少的情况下发生，但其力量 and 影响极大，可淹没与此同时存在的所有其他变化过程。

第二讲 金融市场

应该对接近均衡和远非均衡的状态加以区别，前者的特点是波动的随机性，后者的特点是泡沫占支配地位。接近均衡的状态是普通日常情况的重复，构成一般的统计概括。远非均衡的状况下会发生独特的历史性事件，其后果一般不确定，但是有可能打破基于日常情况的统计概括。

在接近均衡的情况下形成决策的原则，不适用于远非均衡的情况。最近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有一种假设，即价格从假定均衡的情况下偏离是随机发生的，建立在此假设基础上的所有风险管理办法，以及合成金融产品都失灵了。数学模式在接近均衡的情况下可以为人们服务得很好，但在非常情况下仍依赖这些模式的人则受到了重创。

我从最近的金融危机中对远非均衡的情况得到了一些新的见解。作为参与者，我必须在巨大的时间压力下行动，我无法收集到现有的全部信息，负责监管的机构也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远非均衡的情况会失控。

这种情况不仅限于金融市场，我在苏联解体时也有过这种感受。理性预期理论排除了参与者的思维是受时间局限的，而并非不受时间约束这一事实。

尽管我意识到了反射性的不确定性，但我还是对 2008 年的不确定性所达到的程度感到意外和震惊。它使我损失惨重。我对市场总的方向看得对，但对其易变性没有留出足够的余地。结果，我的仓位过大而无法承受易变性造成的波动，有几次为了控制风险，不得不在错误的时机降低仓位。如果我仓位较低并坚守住，情况会好一些。我从这个教训中认识到，就连不确定性的程度也是不确定的，而且有的时候几乎是无限的。

易变反映了不确定性，易变性增大则需要降低风险暴露。这会导致凯恩斯所说的“流动性偏好”提高，是金融危机中特有的强迫清算的又一个因素。当危机减退，不确定性的范围缩小时，流动性偏好停止上升并最终下降，使股市几乎是自动地反弹。这是我最近学到的又一个经验。

需要指出的是，接近均衡和远非均衡状况的区分，是我为了使人们对令人迷惑的现实有所理解而提出的，并不是对现实的准确描述。现实永远比我们说的二元化的概念要复杂得多。最近的这次危机可与百年不遇的风暴相比。它是由已有的若干危机导致的，这些危机相当于五年或十年一遇的风暴。曾成功应对较小风暴的监管者，用类似方法去应对百年风暴就不灵了。

这些一般性的说明为解释最近的金融危机的特定假设奠定了基础。尽管假设不是通过逻辑从我关于泡沫现象的理论推断而来，但两者是成败与共的。

现在我就来讲这个假设。我认为，2007 年引人注目的次贷泡沫引起了超级泡沫的爆裂，就像一个普通的炸弹引发了核爆炸一样。美国的房地产泡沫是最普通的一种，唯一不同的是债务抵押债券及其他合成证券的泛滥。在这个普通泡沫的背后，有一个大得多的超级泡沫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不断积聚，这是比较独特的。

这一超级泡沫的主导趋势是信贷和杠杆使用的无止境增长。主导的错误观念认为，金融市场可以自我调节，所以应听之任之。里根总统称其为市场的魔力，我称其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这是在里根任美国总统和玛格丽特·撒切尔任英国首相的 20 世纪

80 年代里主导的信条。

使这超级泡沫如此特别的，是金融危机在促使其膨胀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由于市场可以自我调节这一错误观念，超级泡沫促成了一系列的金融危机。最早和最严重的是 1982 年的国际银行业危机。随之又有许多其他危机，其中最明显的有 1987 年 10 月投资组合保险的崩溃（portfolio insurance debacle），1989 ~ 1994 年以不同形式出现的储蓄和贷款危机，1997 ~ 1998 年初露端倪的市场危机，和 2000 年互联网泡沫的破灭。每一次金融危机出现时，监管当局都进行干预，将失败的金融机构并入其他机构或用其他办法解决，并采取货币或财政刺激手段对经济进行保护。这些措施强化了不断增长的信贷及杠杆主导趋势；但只要奏效，这些措施也强化了可以放任市场去自我调节的主导错误观念。这是一种错觉，因为其实是政府的干预挽救了金融体系。尽管如此，这些危机变成了对一个错误观念成功检验的证明，使超级泡沫进一步膨胀。

最终，信贷的膨胀变得无法维持，超级泡沫爆裂。2007 年次贷市场的崩溃，导致一个市场接一个市场很快地崩溃，因为它们是相互关联的，而且防火墙已因取消监管而被拆除。这是最近这次金融危机与此前所有危机的不同之处。此前的危机成了肯定及强化这一过程的成功检验，而 2007 年的次贷危机是转折点。崩溃以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达到巅峰，促使金融监管当局进行大规模的干预。

我的繁荣—衰退模型的特点之一，是它无法事先预测一个检验是否能成功通过，这对一般泡沫和超级泡沫都是如此。我以为 1997 ~ 1998 年出现的市场危机会成为超级泡沫的转折点，但我

错了。监管机构挽救了金融体系，使超级泡沫得以继续膨胀。这使 2007 ~ 2008 年终于到来的崩溃来得更加凶猛。

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金融市场不得被加上人工生命维持器。这不仅是对金融界，也是对整个实体经济的打击。国际贸易受打击尤为严重。但是人工生命维持器奏效，金融市场稳住了，经济逐渐复苏。一年之后，整个事情犹如一场噩梦，人们希望把它忘掉。有一种普遍的愿望，想把这场危机只当做无非是又一个危机来对待，然后回到一切照旧的状态。但现实不太可能让人满意。整个体系实际上已经崩溃，需要彻底修整。

我的分析为必要的监管改革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思路。第一，也是最重要的，鉴于市场有产生泡沫的倾向，金融监管机构必须承担起防止泡沫变得过大的责任。艾伦·格林斯潘等人已明确地拒绝承担这一责任。格林斯潘说，如果市场不能识别泡沫，监管者也不能，他说的是对的。但是无论如何，金融监管机构必须承担此项职责，而且明确知道他们不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不犯错误。但是他们可以从错误的反馈中受益，知道是做得太过还是不够，然后对错误进行纠正。

第二，为了控制资产泡沫，仅控制货币供给是不够的，还必须控制信贷的可得性。这不是仅靠货币途径可以做到的，还必须采用信贷控制。目前所知的最佳控制办法是保证金要求和最低资本要求。现在这些要求是不考虑市场情绪而制定的，因为市场不应该有情绪，但市场确实有。为了控制资产泡沫，金融当局需要采用不同的保证金要求和最低资本要求。

监管者也许还需要发明新的办法，或者重新起用已废弃的一

第二讲 金融市场

些办法。比如，很多年以前，我在金融界工作的早期，中央银行会指令商业银行限制对某个经济板块的借贷，如房地产或消费者贷款，因为他们感到那个板块发展过热。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认为，这是对市场机制的粗暴干涉，但他们错了。当我们的中央银行曾经这样做时，没有危机可谈。中国的监管机构现在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对银行业的控制要好得多。在繁荣时期，中国的商业银行在其央行中国人民银行必须保持的存款额增加了 17 倍，而监管部门扭转方向时，他们也欣然服从。

再看一看互联网的繁荣。格林斯潘在 1996 年谈论“非理性繁荣”时较早地看到了这一点。但除了著名的演说外，他没有做任何事情阻止其发生。他感到使用减少货币供应的手段太生硬，他是对的。但是他可以要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冻结新股票的发行，因为互联网的繁荣是被资产杠杆刺激起来的。而他并没有做，因为那会违反他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信条。这是错误的。

第三，鉴于市场的潜在不稳定性，除了影响市场个体参与者的风险之外，还有系统性的风险。参与者可能会忽视这些风险，认为他们总是可以将头寸转手给别人，但是监管者不能忽视，因为如果太多的参与者这样做，会出现斩仓引起的间歇波动，在更坏的情况下甚至会引起崩溃。监管者必须关注参与者的仓位，以发现潜在的不平衡。这意味着，所有主要市场参与者，包括对冲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都需要被监控。某些衍生品，如信贷违约互换和触碰失效期权等，尤其易于制造隐蔽的不平衡，因此必须被监管，而且适当时应被限制或禁止。合成证券的发行，就像普通证券的发行一样，需要得到监管部门批准。

第四，我们必须认识到，金融市场的运转是单向的，不可逆

的。监管机构在履行防止系统崩溃的职责时，实际上是对所有“太大而不能失败”的机构作出了默许的担保。只要这些机构仍是太大而不能失败，就不可能放心地撤除这种担保。因此他们必须实施监管，以确保不需要进行此担保。“太大而不能失败”的银行必须降低杠杆率，并且接受对储蓄者的存款如何使用的限制。存款不应被用来做自营交易。监管者还需要走得更远，必须监管这些自营交易者的补偿方案，以确保风险与回报相匹配。这也许会将自营交易者推出银行而进入对冲基金，但那是他们本来应去的地方。

正像油轮分成不同的仓以保持平稳一样，不同的市场之间也应设有防火墙。也许像 1933 年的《格拉斯 - 斯蒂格尔法案》那样把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分开不太实际，但必须有内在的机制，将各种市场中的自营交易彼此分开。一些已经形成准垄断地位的银行，也许必须拆散。

第五，《巴塞尔协议》的起草者们犯了一个错误：他们把银行持有的证券风险等级定得比一般贷款低得多，忽略了证券集中持仓所具有的系统性风险。这是加剧这场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要纠正这一问题，必须提高银行持有证券的风险评级，这也许会降低贷款的证券化。

所有这些措施都将降低银行的利润率和杠杆率，这就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时机问题。现在不是进行永久性改革的时机。金融体系和经济都远非均衡，而且不可能用一个直截了当的纠偏措施使其达到接近均衡的状况。就像汽车打滑时，必须先把方向盘转向打滑的方向，然后才能再正过来一样，近期内要做的，与长远的

第二讲 金融市场

需要几乎完全相反。首先，失去的信誉，必须先用剩下的唯一可信的东西补回来，这就是国家。这意味着增加国债和扩大货币基数。随着经济的稳定，必须以与恢复信誉同样快的速度缩小货币基数，否则通货紧缩将被通货膨胀的幽灵所取代。

我们现在仍处于这一谨慎驾驭的第一阶段。银行尚在摆脱困境的自救过程中，现在降低他们的利润率只能起反作用。监管改革需要等到第二阶段，即当需要控制货币供给时进行，而且需要谨慎地过渡到这一阶段，以避免干扰经济的恢复。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忘记，监管制度需要进行改革。

你们已经看到，我对金融市场的解释，即反射论，与有效市场假说十分不同。严格来讲，这两种理论按照波普尔的标准都可能被证伪。我预言超级泡沫的破灭是在 1998 年。那时我错了，现在我是对的吗？面对所有这些证据，一些有效市场假说的支持者们仍在维护这个理论。

人们越来越普遍地感到，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范式，而且我认为我的理论比现有的其他理论可以提供更好的解释。行为经济学正日益得到认可，但它只触及反射性的一半，即对现实的误解，而没有研究错误定价改变基本面的途径。

我知道我关于金融市场的理论还是很不完美的，需要进一步研究，而且显然对其充分拓展不是我一个人能承担的。因此将我的理论称为新的范式也许还不成熟。但有效市场假说已被结论性地否定，金融市场急需新的解释。更重要的是，建立在市场可自我调节的错误基础上的全球金融市场大厦，必须从根本上重建。

本讲到此结束，但我还要宣布一件事。我决定资助建立“新经济思想研究院”。它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机构，鼓励对非主流范式进行研究、开设讲习班和课程。我将在未来十年中出资 5 000 万美元，希望还有别人加盟，使该研究院的预算能达到每年 1 000 万美元或更多。

我希望反射概念将成为人们探讨的一个课题，但显然不应是唯一的。我意识到了同时作为积极倡导者和资金赞助者之间潜在的利益冲突。为了避免这一点，我想在我和研究院之间竖起一道隔离墙。为此目的，我将通过中欧大学提供资助，而我个人不参与研究院的管理。挑选被赞助人的评审团将得到明确授意，鼓励研究除反射论之外的其他理论。

我计划于 2010 年 4 月 10 ~ 11 日，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举办的关于金融危机教训的研讨会上，宣布新经济思想研究院的成立。希望新的经济思维会在中欧大学找到自己的家园。

第三讲

开放社会



今天我将介绍我的理念架构的第三个支柱，就是开放社会。前几讲中，我总结了从自己一生的研究和试验中得出的结论，现在我将进入新的领域。我对开放社会的观点随着时间已有变化，并且仍在发展。因此，后两讲将有更多探讨的性质。

开放社会与反射性之间的联系还远不清楚。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两者是紧密相关的。你们会记得，我在研究经济学理论时，也在读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正是波普尔所坚持的我们与生俱来有谬误性的观点，引导我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进行质疑，进而发展了反射性的概念。

但是在概念的层次上，这两者的关联只是间接的。是第一个支柱，即谬误性，将开放社会与反射论联系在一起。在这里，谬误性不仅意味着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总是不全面的和扭曲的，还意味着，在我们努力将极其复杂的现实简单化时，经常会作出错误的解释。而且我们的错误观念对历史进程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如果我的思想有任何真正的创意，那就是对错误观念的强调。它为批判性思维和开放社会提供了强有力的论据。

波普尔没有给开放社会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因为他更喜欢从相反的方向来探讨事物，即先对其进行描述，然后再给一个名称标签。他命名为“开放社会”的社会组织形式与民主制度很相近。

他的研究方法的净效应，是用认识论的观点证明民主制度的合理性。鉴于认知的完美是人的智慧无法达到的，一个以言论和思想自由以及选举自由为特征的社会，比强加其意识形态的社会更可取。由于经历过纳粹的迫害，我感到这个论点很有说服力。

波普尔的哲学思想使我更敏感地意识到错误观念在金融市场中的作用，而反射性的概念使我提出了关于泡沫现象的理论。作为市场参与者，我从中得到了很大帮助。

在作为对冲基金经理成功之后，我经历了某种程度的中年危机。那时我接近 50 岁。我的对冲基金增长到 1 亿美元，其中 4 000 万美元归我个人所有。我觉得我为自己和家庭挣的钱已足够，而且经营对冲基金的压力和对人的消耗极大。什么是值得我继续去做的事呢？

我苦苦思索，终于决定建立一个致力于促进开放社会的基金会。我为它确定的宗旨是，促使封闭社会逐渐开放，弥补已开放社会中的不足，和倡导批判性的思维方式。

随着时间推移，我越来越多地投入公益慈善事业。1984 年，我在匈牙利建立了一个基金会，那时它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1986 年在中国，1987 年在波兰和苏联也建立了。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时，我的基金会网络几乎覆盖了所有以往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三讲 开放社会

我从中取得了一些建立开放社会的实际经验，学到了很多，发现了一些本应知道的事情。比如，封闭社会的解体不一定导致开放社会的诞生，而可能是持续解体，直到一个新的政体出现。这个新政体与倒台的政体相比，与开放社会有更多的相似之处。

迫使我更彻底地重新考虑开放社会的观念，是2004年布什总统（George W. Bush）在美国再次当选这一事实。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和最成功的民主社会，却违背了它所应该坚持的原则，以对恐怖主义宣战的名义违反人权，以不实之词入侵伊拉克。然而他再次当选了。这怎么可能呢？我不得不问自己：美国出了问题？我写了两本书试图给以回答。我指责布什政府误导人民，又指责人们允许布什政府误导他们。

随着更深入地探索，我开始对自己的理念架构提出疑问。我发现开放社会概念有一个缺陷。波普尔主要考虑的是对现实的理解，他从认识论而不是从政治的角度提出了支持开放社会的论据。他说：“只有民主制度能够提供允许非暴力地进行变革的框架，所以要在政治事务中使用理性。”

但他的论点是基于一个暗含的假设，即思维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实。但实际上不一定如此。操纵功能可能被摆在优先于认知功能的位置。的确，在民主社会中，政治家的首要目标是当选，然后是执政。

这一相当明显的洞察对开放社会的概念又提出了一些问题。波普尔为什么理所当然地认为，自由的政治讨论是为了理解现实？更令人奇怪的是，为什么在反射性概念中强调操纵功能的我，竟会如此盲目地追随他的说法？

这两个问题使我得出了同一个结论：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深深植根于思想的传统，这一传统或是忽略了操纵功能的作用，或是认为其作用是从属于认知功能的。

不难看出为什么这种世界观会如此根深蒂固。认知功能的目的是产生认识，认识是通过符合事实的表述表达的。为了确立对应关系，表述和事实应该是明显区分的。因此对认识的追求，要求思想与思想的对象区别开。这一要求导致以思维为主的哲学家们相信，理性与现实是分隔的。这种二元论来源于希腊哲学，并且在启蒙时期主宰人们的世界观。

启蒙时期的哲学家们将其信仰置于理性之中。理性应该像探照灯一样照亮消极地躺在那里等待被发现的现实。理性所起的可塑造现实的积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了。也就是说，启蒙思想没有意识到反射性。其结果是对现实看法的扭曲，但这在当时的的发展时期是恰当的。

在启蒙时期，人类对自然力量的认识和控制能力还相对很少，科学的方法提供了无限的希望；所以把现实想象成消极地等在那里被发现，而认为理性积极地参与对现实的发现和探索，是很正常的。毕竟，那时连地球都还没有被完全认识。收集事实并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有意义的。知识可以从多个不同的方向，用多种不同的方法获得，显示了无限的可能。理性扫除了千百年的传统关系和宗教教条，唤起了进步的胜利感。

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用反射性理念正确理解人类事务的困难。法国大革命的领导者认为，理性可以帮助人们从根本上重建社会，但是他们过于信仰理性。社会没有遵从理性的支配，1789年的狂喜演变成了1794年的恐怖。

启蒙时期对现实的错误解释，是由于在思维和现实之间引用二分法，以使理性能够获得完美的认知。这一二分法并不是事物的主体中固有的，而是启蒙时期的哲学家们为了说明现实而引进的概念。

启蒙时期哲学家们的错误已经有了一个名字，后现代主义者称之为“启蒙期谬误”。我在此将接受这个名称。但要说明一点，即我们所谈的是一个易扩散谬误，它包含一个有价值的真理核心（kernel of truth）。

我现在再准确地解释一下我所指的“易扩散谬误”。我们有能力获取知识，但是永远不可能有足够的知识允许我们据此来作所有的决定。接下来即是，当某一个知识被证明有用时很容易过分使用，并延展到它不再适用的领域，这样它就成了谬误。

这就是启蒙时期所发生的情况。理性与现实之间的二分法在研究自然现象时运用得很好，但是在有关人类事务的研究中就成了误导。易扩散谬误存在于历史的其他分支中，就如同金融市场上的泡沫现象。

启蒙期谬误深深扎根于我们的世界观中。它使波普尔宣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应使用同样的方法和标准，导致经济理论要效仿牛顿的物理学。波普尔卓越的科学方法和经济学理论，都未能认识到反射性。更糟糕的是，就连我本人，反射性的发现或发明者，居然也未能认识到，波普尔关于开放社会的观念，是建立在认知功能优先于操纵功能的隐含假设基础上的。也就是说，我们是在试图找到真相，而不是操纵人们去相信我们想让他们相信的事。

启蒙期谬误，也深深扎根于有效市场假说及其政治衍生

品——市场原教旨主义之中。两个理论中的这个谬误，被金融体系的崩溃以令人震惊的方式暴露出来。我对开放社会理念这一弊病的发现不太惊讶，因为这个观念被接受的面比较小；但对我个人来说，这两者同样惊心动魄。它迫使我对开放社会的理念重新思考。

我并没有放弃对开放社会的信念，但是我意识到，它需要更强的论据来支持。波普尔理所当然地认为，在开放社会中认知功能优先于操纵功能；我现在认识到，要使开放社会发展繁荣，这必须作为一个明确的前提提出。现在我来说明我是怎样得出这个结论的。

在民主社会中，政治讨论的目的不是发现事实（认知功能），而是当选和执政（操纵功能）。其结果，自由的政治讨论不一定比压制异议的专制政权产生更有远见的政策。

更坏的是，在操纵现实的政治竞赛中，承诺尊重真相成了一种障碍。布什政府有一个强有力的右翼宣传机器为其服务，不感到有尊重事实的需要。这给了他决定性的优势，因为更传统的政治操纵者是在启蒙期谬误的影响下，感到要受事实的制约。

美国最成功的右翼宣传家之一弗兰克·伦兹（Frank Luntz）公开承认，他把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1984》一书当做他设计标语口号的教科书。作为开放社会的信奉者，我对此感到震惊。为什么奥威尔式的谎言在一个开放社会里可以成功？

这样的发问为回答我自己提出的问题“美国出了什么问题”提供了线索。人们已不太在意追求真理。越来越复杂的操纵技巧使他们已习惯于不在意被欺骗，甚至看起来是在积极请求被欺骗。

人们已变得习惯于接受事先包装好的信息，因而就有了拿钱作政治广告的影响。他们更有兴趣的是娱乐而不是知情，因而就有了比尔·奥雷利（Bill O'Reilly）和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这样的大众评论员的影响。

操纵的技巧随着时间逐渐发展。它开始于19世纪末，在商业界，企业家发现可以通过商标和广告突出其产品而提高利润率。这引发了对消费者动机的研究、对信息的检验和对专题小组的运用，由此形成了一个使公众行为有所改变的反射过程。这促进了消费者群体的发展，进而扩展到政治和文化领域。

经济学和政治赖以立足的隐含的假设被逐渐暴露出来。经济学理论认为供求条件是既定的，并说明自由市场如何可以在完美竞争的情况下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但是需求曲线的形成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受广告操纵。代议制民主的理论假设，候选人会对他们自己及其纲领作出说明，投票人会选择他们喜欢的。这种假设没有预期候选人会研究公众的观点，然后讲选民想听的话。这两种理论都没有考虑现实可被操纵。

对现实的操纵也成为人文科学的一个重要主题。是文学评论最终导致了后现代世界观的发展，将启蒙思想搞得天翻地覆。它否定了—一个可以被理性发现的客观现实的存在；实际上，它认为现实经常是互相矛盾的叙述的综合体。

我对后现代主义的世界观曾经根本不予理会，因为它与我对客观现实的深深的尊重相冲突。直到读了罗恩·萨斯金德（Ron Suskind）发表在《纽约时报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我才打开眼界，

看到我过去没有认识到的后现代世界观与布什政府的宣传机器之间的关联。他引用这个宣传机器的主要操纵者之一的话说：“我们行动时，就是在创造自己的现实。当你们研究这一现实时——你们会审慎地研究——我们会继续行动，创造新的现实。”

这迫使我改变我的态度。我必须更认真地对待后现代的观点，把它看做易扩散谬误。它与启蒙期谬误有同等重要的影响，而且在当前也许影响更大。但是我仍然认为，与启蒙期谬误相比，后现代主义的谬误更大，易扩散性更小。把操纵功能置于优先地位，无视了客观现实的坚实核心是无法操纵的。在我看来，这比启蒙期谬误忽略了操纵功能是更大的缺陷。

根据启蒙思想家的看法，理性与现实是彼此分开和相互独立的。人们要使现实变得对自己有利的唯一途径，是理解决定事物发展过程的规律。在这种条件下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发现这些规律是第一位的。这一点塑造了人类智能最伟大的成就，即自然科学的发展。只是在对人类事务的研究中，谬误才悄悄溜了进来。

相比之下，后现代的世界观是完全误导性的。它为政治提供了一种非道德的实用主义的手段，可以这样归纳：既然我们已经发现现实是可以操纵的，为什么要给认知功能以优先地位呢？为什么不直接进行操纵？为什么不追求权力而要追求真理？

这个问题是有答案的，即尽管现实可以被操纵，但其结果肯定与操纵者的意图相悖。这种偏离有必要被保持在最低限度，而这只能通过更好地理解现实来达到。正是这一系列的推理使我认识到，要把追求真理的承诺作为开放社会的前提明确提出来。

这个抽象论点可用具体事例佐证说明。看一看布什政府，它

在操纵现实上非常成功。通过对恐怖主义宣战，它使整个美国都站到总统一边，为入侵伊拉克铺平了道路。侵略是为了确立美国在世界的至高地位，但结果截然相反。美国的力量和影响急转直下，小布什被普遍认为是美国迄今为止最糟糕的总统。

这个例子应该是有说服力的。然而，随着反射性概念逐渐被接受，用它来作出对后现代谬误有利的错误解释是危险的。现实的反射性太难理解，人们很容易被简单的答案误导。理解这个论点，即有效的预测并不一定证明预测所基于的理论是正确的，要花一生的时间；而一个花钱作的政治广告只需 30 秒钟。接受后现代主义的世界观很有诱惑力，但是不注重客观现实的存在是危险的。使人能切身感受到客观现实的一个方法，是提醒人们注意死亡是生活中的现实这一事实。我们的头脑很难接受人将不复存在的想法，所以关于来世的各种说法和神话应运而生。阿兹特克人（Aztec，墨西哥印第安人）的一种仪式使我很惊讶：几个队在玩球的游戏里竞争，赢者被奉献给神。这是此类神话的一个极端例子，事实是赢队的人死了。

尽管如此我必须承认，来世不存在这一观点无法向相信它的人去证实。我坚信现实的客观性的重要性，这是我个人的信念。的确，它与宗教信仰有令人好奇的相似之处。我所认为的现实的客观性，有一神论中神的许多属性：它无处不在，无所不能，但它是怎样起作用的仍然有些神秘。

我对现实的客观性十分尊重，而且我过去认为这是常识。后来我认识到，这种态度并不常见，而这与我的个人经历有关。

我的个性形成于 1944 年德国占领匈牙利时。在我父亲明智

的带领下，我们不但幸存下来，而且能在危险的情况下帮助别人。这使 1944 年对我成了一个积极的经历，激发我愿意去面对严酷的现实。

这种态度在我参与金融市场后得到进一步强化。我是一个喜欢冒险的人，经常将事情推向极限，但又避免超过临界点。我学会了注意所有可能出错的地方，以防制造令人不快的惊讶。我选择的投资是在最坏情况下风险回报比率也有吸引力的。这使我特别注意所有情况下的不利一面。

后来我更积极地投入我的基金会的工作。在这里，我能做一些积极的事情以减少不公正，这使我更加乐于认识和面对严峻的现实。一个对现实的消极评估会成为积极参与的诱因。

结果我的基金会将很多资源投入看上去无法解决的问题，例如对毒品的政策，以及缅甸、海地、利比亚、塞拉利昂和刚果等似乎毫无希望的地方。不用说，去打失败之战不是多数基金会偏爱的选择。

对现实的客观性的笃信在我的思维中的作用，与宗教在有些人的思维中的作用是一样的。在没有完美认知的情况下，我们需要信仰。我相信的是严峻的现实，有些人相信的是神。

但我仍然要说，当社会无视现实的客观性时，是将其自身置于危险的境地。如果我们为了回避令人不快的现实而欺骗自己或选民，现实将让我们达不到预期而受惩罚。

的确，现实可以被操纵，但是我们行为的结果，不是受愿望支配的，而是受一种外在现实的支配，至于它是如何这样做的，我们还不能完全理解。我们对此理解得越好，结果就会越符合我们的意图。对现实的理解是认知功能。这也就是为什么认知功能

应被置于操纵功能之上，并引导操纵功能。无视不能被完全理解的客观现实的存在，将导致后现代谬误。

综上所述，在近代史上，对思维与现实的关系，人类已接受了两种谬误：启蒙期谬误和后现代谬误，它们是彼此关联的。启蒙期谬误没有认识到人的活动中操纵功能的普遍存在，而对操纵功能的发现导致了后现代谬误。每一种谬误都只认识到错综复杂的关系的一半。

我的建立在谬误性和反射性的共生原则基础上的理念架构，是这两半的结合。两种谬误的影响力都很大，而我的理念还没有被接受。这说明误解现实是多么容易，而正确地理解现实要难得多。

后现代谬误正在上升期。它导致了布什政府的政策，而且我警觉地注意到，这在奥巴马政府中也开始显现。我指的是一本最近出的书，《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①，是乔治·阿克罗夫(George Akerlof)和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合著的，它对奥巴马政府政策的形成很有影响力。书中大力赞扬作者所谓的“信心增值”的功绩。也就是说作者相信，经济的弊病可以由激励人心的讲话来治愈。这么说有一半是对的：股市的回稳使银行可聚集资本，并通过其他途径使经济有所增强。但是信心增值的说法忽视了反射性的另一半：如果现实没有证实预期，信心会转为失望，正如繁荣可转为衰退一样。我对采纳信心增值的说法深感担忧，奥巴马总统已经接过了衰退的所有权，如果颓势有反复，罪责就在于他。

① 中文版由中信出版社2009年出版。——编者注

将我关于反射性的理论放在对现实的两种错误解释中来讨论，有助于进一步澄清这一理论。特别是有一点也许还不够明确，需要再次强调：客观现实的核心是无法被操纵的，就像死亡的不可避免。后现代谬误所忽视的正是这一核心。

在最近的成功的鼓舞下，我要进一步宣称，我的理念架构提出了对现实的正确解释。这样宣称很鲁莽，而且初看上去是自相矛盾的。一个对现实的正确解释，怎么可以与人的理解是固有不完美的原则相协调呢？这很容易，就是指出反射性对参与者的思维和事物的发展都注入了不确定性。一个承认未来的不确定性是与生俱来的理念架构，不会被指责是完美的。

但它能够对现实提供重要的洞察，甚至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预测未来，尽管范围本身是不确定和可变的，正如我们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中所看到的。通过承认不确定性，我的理念架构可以既做到自我一致，又与现实一致。而且因为它是不完美的，所以允许改进。

实际上我看到进一步的发展大有可为。我的理念架构最初是在卡尔·波普尔的影响下形成的，只涉及对现实的理解方面的问题。但是当我加上选民应该珍视诚实、惩罚欺骗的要求时，就进入了价值的范畴。价值范畴的不确定性比认知范畴更明显，所以还需要进行很多思考。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真相很难确定，而且往往很难支持。最省事的做法会导致相反的方向：回避令人不快的现实，鼓励欺骗，只要能让人相信。开放社会要保持开放和繁荣兴盛，则必须抵制这些倾向。

这个对策对现在的美国尤为重要，因为美国正面对金融危机后遗症这个极其令人不快的现实。美国过去 25 年中一直在超前消费，用借外债使收支相抵。现在房地产泡沫已破灭，消费者支出过多需要重建储蓄。银行业已经崩溃，需要赢利以摆脱困境。

布什政府以不实之词入侵伊拉克时是故意误导选民。不能说奥巴马政府是有意欺骗，但它已经接受了国家不愿面对严峻的现实这一点，而采纳了“信心乘数”的说法。

不幸的是，客观现实不太可能满足被信心乘数激起的期望。与此同时，政治反对派对总统的攻击也不会受事实的约束。在这种情况下，对选民应致力于追求真相的要求很难满足。这为我的基金会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课题，但是美国目前的民主状况不能有力地支持把开放社会作为更好的社会组织形式。我需要找到一个更有力的论据。

一个较好的办法是回到美国建国之父们那里，他们理念的形成为大大早于开放社会理念的提出。建国之父们的伟业建立在个人自由的价值基础之上。他们采用的认识论是有缺陷的：《独立宣言》中宣称，“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显而易见的”，但其实并非显而易见。不论是否显而易见，个人自由的价值是永恒不变的。经历过专制政权的我执著地信仰它，而且有这种信仰的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回归建国之父们的理念还有一个很大的优越性：可以讨论权力的关系。宪法通过权力的分治来防止专制独裁。权力的分治思想认识到，社会中有相互竞争的利益和对现实不同的解释，需要由政治程序来协调。宪法中的权力制衡，可以防止形成宣称握有

绝对真理的人拥有绝对的权力。宪法建立了政府的不同分支互相作用和彼此制约的机制，但这还不够。

只有当人们可以对当权者说真话时，开放社会才能成功。它需要法治保障言论和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以及其他权利和自由。这些保障能使公民不受权力滥用的践踏，并通过司法体系得到这种保护。这是建国之父们创建的开放社会。

让我说得更明白一些。开放社会是一个有吸引力的社会组织形式，它既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也是目的本身。它可以使社会理解面临的问题，并且能比其他形式的社会组织更成功地处理这些问题，但前提是，要将认知功能置于操纵功能之上，而且人民要愿意面对严峻的现实。

也就是说，民主的工具性价值（instrumental value）是有条件的，要看选民是否执意追求真理。在这一点上，美国民主目前的表现不如过去的成就。我们不能依赖美国制度固有的优越性，需要重新证明自我。但是除了工具性价值外，开放社会还有其内在价值，就是个人的自由，无论开放社会兴衰与否，它都同样适用，比如它就适用于苏联。

当然，个人的自由必须与公众利益和其他人的自由和谐共存。

再者，个人自由的内在价值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在中国，集体的利益优先于个体的利益。这是 2008 年奥运会开幕式上表现出的明确信息。它显示，在准确的时刻准确地按照指令去做被告知要做的事，可使一个巨大的个人组成的群体，呈现出蔚为壮观的场面。

随着美国和中国之间大国关系的变化，个人自由的价值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变得越发重要。我将在最后一讲里谈这个问题。

第四讲

资本主义与开放社会



今天，我想探讨一下资本主义与开放社会，以及市场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冲突。我将间接地涉及这个主题，在此之前先介绍一下最近才引起我注意的一个现象，但它在我的思维中已占据重要的地位，我几乎可称之为我的理念架构的第四个支柱。这个现象就是代理问题（agency problem）：代理人理应代表其委托人的利益，但事实上他们趋于将自己的利益放在其所应代表的人的利益之上。

代理问题已经被经济学家们广泛分析过，但完全是从合同和经济动机的角度出发，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伦理和价值观问题。而剔除伦理因素，问题就变得很难驾驭。如果诚实和正直这样的价值取向在人们的行为中失去控制，人就会变得日益只受经济动机的驱使。

市场原教旨主义宣称的“价值中立”（value-free），实际上是削弱了道德价值观。

按照假设，市场被看不见的手操纵，因而十分有效。参与者在作买入与卖出的决定时无须进行道德判断，因为其行为不会对市场价值产生任何有形的影响。

事实上，主宰金融市场的规则是由政治家的有形之手制定的，因此在代议制的民主社会中，政治家陷入了代理问题。

这样，代理问题对代议制民主和市场经济都提出了不求助道德原则将无法解决的重大挑战。这就是为什么代理问题在我的思考中占了如此重要的位置。我想先分析一下代理问题，然后再讲资本主义与开放社会的冲突。

现在让我从头说起。我最早接触代理问题与所谓的“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有关。我说的资源诅咒，是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常常受腐败或专制政府、暴乱和内战的折磨，致使那里的人们比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的人民更贫困，生活更悲惨，例如刚果、苏丹、塞拉利昂和利比亚。

我支持的非政府组织之一“全球见证”（Global Witness），在“公布支付”（Publish What You Pay）的口号下发起了一个运动，敦促石油公司和矿业公司公布他们向各国政府的支付。这样人民可以知道和计算政府在资源上的所得，并令其负责说明收入的使用。

于2002年发起的这个运动有一段有趣的经历。这个主意结果成了一个易扩散谬误，因为尽管公众舆论可以对大石油公司施加足够的压力，但是有背景的开采者和非民主政体国家的大公司不大易受影响和约束，所以支付总额无法计算。

所幸，这一事业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它发起了“采掘业透明行动计划”（Extractive Industries Transparency Initiative），将政府、大公司和公民社会召集在一起，确立对大公司和政府都同样适用的透明度国际标准。签署了此倡议的国家，政府负责公布收

第四讲 资本主义与开放社会

人数额。在尼日利亚和阿塞拜疆等国，这一计划已见到积极成果。

在分析“资源诅咒”问题时，我开始重视我所说的“不对称代理问题”。根据现代主权概念，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属于它的人民。但是其政府，本应是人民的代理人，却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其所应代表的人民的利益之上，从事各种腐败活动。而另一方面，国际石油和矿业公司的管理层，对其公司的利益又代表得过分好，以致他们会贿赂政府以取得特许权。对这种贿赂的心甘情愿的给予和接受，是“资源诅咒”的根源。

一旦意识到了代理问题，我就发现它比比皆是。苏联东欧的失败是因为代理人的问题。马克思关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主张很有吸引力，但是苏联东欧的领导人将他们自己的利益放在了人民的利益之上。

代理问题也是代议制民主的祸根：被选出的代表利用权力为自己谋利而损害公众利益。

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中，代理问题被证实是金融体制失灵的原因。当金融工程师通过发行债务抵押债券将房屋抵押贷款变为证券时，他们以为是在通过地域多元化降低风险，而事实上是将创造和发行合成证券的代理人的利益与证券所有人的利益分割开来，从而制造了一种新的风险。代理人更感兴趣的是赚取手续费，而不是保护其委托人的利益。

所以代理问题似乎无处不在。

然而尽管其影响普遍深入，但直到近期，这个问题一直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在我当学生的时候，这一问题几乎完全没有被认识。过去20年中注意的人多了一些，但仍然以研究合同及经济

动机的经济学者为主。实际上，代理问题更多的是道德问题，而从合同及经济动机角度分析，其实更加剧了道德问题。认为人的行为受合同及经济动机主宰的原则，其效果是取消或至少减少了道德因素的考量。这听上去似乎违反常理，因为反射论还没有被很好地理解。

价值观不如认知观念与客观现实的联系那么密切，因而更容易受人们所接受的理论的影响，经济学理论就是一个佐证。市场被认为应该像看不见的手一样使供求平衡。看不见的手之所以如此有效，是因为不需要作道德判断；所有的价值都可以用钱来表示，而钱是可互换的。罗马人曾经说“钱是没有味的”。但是如果理所当然地认为，所有人的行为都是被个人利益左右，就没有了道德判断的余地——而缺乏伦理准则，社会将无法存在。

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受市场价值左右，而市场价值在性质上，与人们作为社会成员时左右他们行为的道德价值很不相同。这引出了我尚未解决的市场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矛盾的一系列有关问题。同时我也被布鲁斯·斯科特（Bruce R. Scott）简短的专著《资本主义的概念》（Springer 出版社，2009 年）所鼓舞。因此，我可能有了新的见解。的确，我都被自己得出的一些结论震惊了。

斯科特指出，资本主义被错误地解释，与市场机制混为一谈。他将此扭曲主要归因于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我不这么具体地指向某个人，而是将其归因于市场原教旨主义。斯科特还说，无形的市场之手的背后隐藏着人类机构的有形之手，即制定规则的政治程序。这里就出现了代理问题，也

第四讲 资本主义与开放社会

出现了市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矛盾。

美国是一个建立在个人自由基础上的民主和开放的社会，个人受宪法和法律保护。同时，美国的经济建立在市场机制上，允许个人在不受政府机构独断行为的不适当干预下自由交换。这种政治和经济制度看起来搭配得天衣无缝。人们可以轻易地将开放社会与市场经济相提并论，许多人，包括我自己，也经常这样做。但表面现象容易使人迷惑。资本主义与开放社会，市场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有根深蒂固的冲突。但这一冲突一直被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成功地掩盖着，它从 20 世纪 80 年代里根执政时起开始凸显出来。

市场机制的明显特征是“非道德的”（amoral）：一个人的 1 元钱与另一个人的 1 元钱完全等值，不论它是怎样获得的。正是这一点使市场变得如此有效：参与者不需要考虑道德因素。在一个有效市场中，个人的决定对市场价格的影响很小：一个人不参与买或卖，另一个人会以很小的差别取而代之。因此，个体市场参与者对市场价格的结果责任不大。“非道德”很容易与“不道德”（immoral）混淆。我常常被问道，尤其是学生听众会问，我是否对在股票市场上赚了那么多钱而有负罪感。我解释说，在我成为公众人物之前（公众人物确实可以影响市场），我的决策过程中不包括道德考量，人们往往无法理解。

但市场仅适合作个人选择，而不适合作社会决策。市场允许个人参与者进行自由交换，这不是为进行社会选择而设计的。制定治理社会的规则，包括市场机制应如何运作，是政治事务的权限。将自由存在、自我管理、自我调整的市场理念延伸到政治领域，颇具欺骗性，因为它从政治中排除了道德考量，而没有这种

考量，政治就无法正常运作。

美国的政治体制采用代议制民主。人民选出代表行使权力，当选者应是人民利益的代理人；但实际上，他们倾向于将自己的利益置于人民的利益之上。竞选要花很多钱，当选的代表感恩于支持者。不按这个游戏规则玩的人不能当选。这就是金钱如何污染政治，特殊利益如何战胜公众利益的。

美国政治体制中的代理问题并不是新问题，它是代议制民主中固有的。对当选的代表提出要求的权力是写在宪法里的，但是当今代理问题似乎比我 1956 年刚到美国时要严重得多。这是为什么？

若干客观历史的发展或许对此负有某种责任，特别是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和操纵公众观点的复杂手段的发展等，但公众道德水准下降的主要罪魁祸首，还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兴起。

我愿意相信在美国初建时，民众真正受到了公民道德的引导。所幸，建国之父们的信念没有过多地依赖于此，而是依赖宪法中的分权制：首创了相互竞争的利益之间的制约与平衡。即使在我 1956 年初到美国时，人们仍然认为应以诚实正直这样的内在价值作为自我行为指南。考虑到在暗中进行的各种不道德行为，这或许有些虚伪，但它毕竟不同于当今的公众生活——赤裸裸地公开承认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成功就受到敬慕，不论成功是怎样得到的。

我不想被误解。把过去描绘得过于美好是上了年纪的人的特点，我不想陷入这么明显的陷阱。我不是说 1956 年时政治家们更诚实，或是社会更公正。自那时以来美国在透明度、问责制和社会公平上已有巨大进步。但是由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在

第四讲 资本主义与开放社会

什么是可以被接受甚至被仰慕的社会行为上也有了重大改变。我所说的公众道德的下降，是非常具体地指，市场价值的非道德性（amorality）已渗透到它不应属于的领域。

我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理解是，它将市场价值不适合地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特别是政治领域。经济学理论声称，在一般均衡的情况下，看不见的手会确保资源的最佳配置。这意味着，人们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也间接地服务于公众利益。这就给了个人利益和利润动机以道德上的许可，允许其取代诚实、正直、为他人着想等美德。

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论点有几处站不住脚。第一，金融市场不是趋于均衡的。一般均衡理论（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认为供给与需求的条件是独立存在的，市场的无形之手继而会将供给与需求导向均衡。这种说法忽略了市场价格与潜在的供给与需求条件之间的反馈环，也忽略了隐蔽在市场机制背后的政治程序的有形之手的作用。

第二，一般均衡理论认为，资源的初始分配是既定的，这排除了对社会公平的考量。更重要的是，该理论假定人们知道自身的利益是什么，而且知道怎样最好地追求这个利益。实际上，在人的想法与事实之间有很大的差距。

尽管如此，市场原教旨主义已经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这是怎么发生的呢？

一个原因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一个主要政策内涵，即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限制在最低程度，是不正确的；而为其辩护的论

据更荒谬。市场机制可能有缺陷，但政治程序更是如此。政治程序的参与者比市场参与者更容易出错，因为政治围绕社会价值运作，而市场参与者的价值是已知的。如我们所知，社会价值极易受操纵，而且政治充满了有害的代理问题。为了防止这一点，必须采取各种各样的防范措施，这使经济领域的政府机构比私人参与者的行为要僵化和官僚得多。所有这些都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要控制在最低限度的论点显得有道理。

因此，市场原教旨主义只是取代了一个不正确的论点，而这个论点本应更为有力。它本可以宣称，所有的人类行为都是不完美的，社会会作出危害较小的选择，据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控制在最低限度。这才是一个合理的论点。相反，他们说政府干预的失败证明自由市场是完美的。这是完全错误的逻辑。

我想说明的是，我谴责市场原教旨主义是一个错误和危险的教义，但是为了其他更好的理由，我支持将政府的干预和监管控制在最低限度。

远远超过一切的对市场原教旨主义最强有力的推动，在于它可以为资本拥有者和管理者的个人利益服务。财富的分配是既定的，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被认为有利于公众利益，控制资本的人还能再奢望什么呢？他们所形成的富有的强有力的集团，有很大的优势推销市场原教旨主义，不仅通过认知的理论，而且通过积极操纵公众舆论。市场原教旨主义给本来是非道德的市场机制赋予了一种道德特性，即将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变为一种美德，类似对真理的追求。它是靠操纵的力量而不是靠理性的力量获胜的。它被一个强大的资力雄厚的宣传机器所支持，扭曲公众对自身利益的理解。例如，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取消只适用于人口 1% 的

第四讲 资本主义与开放社会

上层人士的遗产税的游说会如此成功？

当然在这个领域还有其他竞争的力量在使用类似的操纵手段，但他们的资助不够丰厚，因为他们未能吸引人口中最富有、最有实力的阶层的自身利益。市场原教旨主义在过去 25 年中就是这样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而且即使是金融危机也不足以削弱其影响。奥巴马总统的决定显示了这一点，这一决定避免用给政府多数控股权的方式对银行进行资本重组。

市场原教旨主义不应与有效市场假说混为一谈。信奉有效市场假说的经济学家，不一定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确，很多经济学家是颇具同情心的自由派。但是有效市场假说占据了美国大学的经济学讲坛，这可归因于坚信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资本家和基金会的资金支持。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也应对市场价值侵入其他学科领域负责，如法学和政治学。

资本主义并不与开放社会针锋相对。尽管如此，它仍对开放社会构成某些严重威胁。我已经提到了其中一点，即金融市场不是趋于均衡，而是易产生泡沫。监管的缺失促使了超级泡沫的产生，其破灭会对今后若干年美国的经济产生负面影响。这又揭示了对开放社会的另一威胁：代理问题和金钱对政治的影响，污染了政治程序。

在开放社会中，政治程序应为公众利益服务；而当今的美国，政治程序已被特殊利益把持。我们选举的代表感恩于赞助他们竞选的人，而不是一般的选民。眼下选民对奥巴马总统关于医疗制度改革和能源法案的反应，提供了生动的说明。选民已被洗脑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对有关公共利益进行负责任的讨论几乎变

得不可能，使国民医疗服务和碳排放征税都行不通。我们的选择局限于特殊利益能操纵的方案上。

游说是代理问题的核心。怎样才能使之得到控制？

这是一个道德问题，不是调整经济动机的问题。游说的利润很高，而且即使规则更加严格也仍会如此。在缺乏道德价值取向时，人们总有办法绕过规则。更糟的是，规则的设计制定本身也是为特殊利益，而不是为公众服务的。这是今天美国受重创的金融体系试图重新获得以往的优势时所面临的危险。

有一个解决道德问题的办法：需要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中划分清楚的界限。市场参与和规则制定是两个不同的功能。市场允许参与者自由交易，在这里参与者可以合法地以利润为动机。与此相比，制定和实施规则应以公众利益的考量为指南，利润动机在这里不适用。当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歪曲规则时，政治程序就会变得腐败，代议制民主也不会产生开放社会作为可取的社会组织形式所应有的结果。应该强调，这一论点与目前时兴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态度针锋相对，而且这个教义涉及政治市场。

怎样改进开放社会中的政治程序？我提出了一个很简单的规则：人们应区分自己作为市场参与者和政治参与者的作用。作为市场参与者，我们可以追求个人利益；作为政治程序的参与者，我们应以公共利益为指南。阐明这个规则的道理也很简单。在接近完美竞争的情况下，没有单个的竞争者可以影响最终结果，所以个人在市场中的决定对社会状况没有影响，不论参与者是否在意公共利益。但是政治决定却会影响社会状况，所以政治决定是否为公共利益服务，结果会截然不同。

第四讲 资本主义与开放社会

问题是公众利益无法用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客观标准来确定，它取决于选民的看法，而在没有客观标准的情况下，看法很容易被操纵。操纵是自我强化的；政治主张和相反的主张说得越让人难以相信，则越难以辨认其对与错。正是这一点使得政治程序的效率极低。

相比之下，市场机制的运作要好得多。人们或许不知道什么对他们好的，但利润提供了衡量参与者表现的客观标准。难怪利润动机在引导人的行为的价值取向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利润不仅提供了达到人所追求的不论什么目的的手段，而且它本身也是目的。因为作为衡量成功的可靠尺度，利润可吸引他人的赞赏和改善自我感觉。的确，许多成功的生意人对赚钱比对使用自己的财富更有安全感。

市场价值的传播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回顾历史，基督教曾认为追求利润是罪恶的。这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后来的宗教改革促进了市场的发展，打开了物质进步和财富积累的途径。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革，传统的关系被契约关系代替。契约关系渗透到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生活领域，最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开始被交易取代。变化的步伐已经开始加快，在我一生中，变化的速度就已十分惊人。

我在匈牙利的童年时期和在美国的成人生活差异甚大，1956年我到美国时与今天的美国相比也差异甚大。刚到美国时对我触动很大的是，我看到与匈牙利甚至与英国相比，市场价值已经如此深入地渗透进美国社会。在英国，传统价值观和阶级划分仍占上风。从那时以来，英国和美国都经历了更大的变化。像医学、

法律和新闻这样的专业也变成了生意。在我看来，这对社会造成的不稳定，与市场原教旨主义对金融市场造成的不稳定是一样的。

社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稳定程度，当然各人的看法不同。同样，在上述专业中，利润的动机应占什么样的位置也是可以讨论的。但不容置疑的是，利润动机在政治领域已有极坏的影响，因为它恶化了代理问题。

怎样使代理问题降到最低限度？想让利益攸关的特殊利益集团不去游说国会，是期望太高而不可能的。烟草工业一定会反对禁止吸烟的立法，保险业也一定会反对单一支付的医疗体制。但是在公众利益上，那些非利益攸关的人们的利益，应被置于狭隘利益之上。没有特殊利益的人不必担心所谓的“搭便车问题”，即行为自私的其他人会从他们不自私的行为中受益，因为这种运作的目的就是使公众受益。

归纳起来，前一讲中我谈到了认知功能应被置于操纵功能之上。在这一讲中我要说的是，尽管在现行规则下利润动机是完全合理的，但在制定规则时公众利益应被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我坚信，选民中即使有一小部分人达到这两个要求，代议制民主也会运作得更好。

最后，我想讲一点个人的感受。我已经实践了我所倡导的观点。作为对冲基金经理，我按游戏规则试图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作为一个公民，我试图改变这些规则，即使改革不符合我个人的利益。比如，我和其他金融机构一起支持对对冲基金实行监

第四讲 资本主义与开放社会

管。我坚信，如果更多的人按这个原则办事，我们的政治制度会运转得更好。我也相信，我这样的基金会之所以可以起到重要作用，恰恰是因为遵循这一原则的人太少了。

在我的基金会，即开放社会研究所，我们把保护公众利益不受私人利益侵犯作为使命。我们也支持公民社会向政府问责的努力。我把这些努力称为政治公益慈善事业，我相信它比传统的慈善事业对改变世界会有更大的贡献，因为这样做的人很少。

我处于一个很有利的位置。我比多数人更独立，因为我不必依赖客户或顾客，而且我感到有道德义务更好地利用我的位置优势。当然特殊利益的力量远远大于我的力量，但我至少有一种满足感，即我的钱有更大的稀缺价值。

问题是，特殊利益也在伪装自己是为了公众利益，需要慧眼来识别真伪，特别是因为双方都被迫使用类似的说服手段。在缺乏客观标准的情况下，人们只能通过试验摸索来作出判断。讨论中有良好意愿的一方，往往很难相信另一方有同样的良好愿望。最好的识别办法，是在认可其宣称的表面价值的同时，与他们进行实质性的讨论。这样做的好处，是在政治讨论中给认知功能以优先地位。只有当对方不这样回应时，才应该不再考虑和理睬。这样的人在每个国家都有；不幸的是，在美国他们不是被忽视，而是变得非常有影响力。选民是否拒绝被完全无视真相而企图操纵他们的人所影响，是对每个开放社会能否保持开放的检验。鉴于奥威尔式的宣传的成功，美国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好。

在过去两个世纪中，为美国服务得很好的政治程序看来已经退化了。我们曾经有两个政党竞争中间地带，但是中间地带已经萎缩，政治越来越两极分化。奥巴马总统已尽了最大的努力扭转

这个趋势，试图做一个有凝聚力的领导者，但无济于事。

归根结底，民主制度怎样运作取决于生活在其中的人。我认为，如果更多的美国人将他们作为政治参与者的作用与作为市场参与者的作用区别开来，美国的民主制度会运转得更好。这取决于每个人。我已经这样做了。即使是一个较小的少数群体，对重建正在消失的中间地带也会有帮助。

第五讲

未来的路



在这个系列讲座中，我提出了一个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类行为的理念架构。这些行为不是由永远有效的自然法则决定的。当然这些法则的确存在，但不足以决定人类行为的发展过程。一个原因在于情况的复杂性，另一个原因在于事件参与者的思维所起的作用。

我已经集中讲了反射性的问题，即参与者的思维与现实的双向关联，我也强调了错误理解和错误观念与现实的因果关系。但这两种影响都很奇怪地被忽视了。这些影响给事物注入了不确定因素，结果是除了非常简单的情况以外，几乎不可能预测未来。

但我们仍然可以大略估计几种情况，并评估其可能性，也可以为希望得到的结果拿出对策。我在这两方面都做过，而且有过多次尝试。的确，我可以称为专家，作为投资家，我专注于预测；作为公益慈善家，主要是为解决问题寻求对策。我前者做得成功，足以支持后者。今天的讲座我想从预测和对策这两个方面来谈。

我们当下所处的历史时刻，不确定性的范围异常广泛。我们刚刚渡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这个危机在

量上比以往的危机大得多，在质上也与以往的危机很不相同。可作相关比较的，是 1991 年日本发生的房地产泡沫破灭，至今尚未恢复；还有就是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的大萧条。与日本情况不同的是，那次危机仅限于一个国家，而这次危机席卷全世界；与大萧条不同的是，这次没有允许金融体系垮台，而是给它用上了人工生命维持器。

事实上，美国当今所面临的信贷和杠杆问题的深度和广度比 20 世纪 30 年代要严重得多。1929 年美国的信贷余额是国内生产总值的 160%，到 1932 年增长到 250%；而 2008 年初是 365%，这还不包括 20 世纪 30 年代金融市场上尚未存在而如今广泛使用的衍生品。尽管如此，人工生命维持器居然奏效了。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不到一年，金融市场已经稳定，股市也已回升，经济显示复苏迹象。人们想回到一切照旧的情况，把 2008 年的崩溃只当成一场噩梦。

但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复苏的势头可能会停止，甚至随之出现“再次衰退”（double dip），而我不能确定这将发生在 2010 年还是 2011 年。

持这种观点的绝不止我一个人，但我的观点与目前的主流情绪不一样。复苏的时间越长，就会有更多的人相信复苏；但是据我的判断，这种主流情绪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这是典型的远非均衡的状况，此时人的感知往往落后于现实。更复杂的是，这种落后于现实是双向的：一方面，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这次危机不同于以往——我们是处在一个时代的终点；另一方面，其他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未能预见到复苏反弹的程度。

混乱和困惑不限于金融界，它会延伸到整个国际舞台。

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没有其他大国或国家联盟可以挑战其至高无上的国力。但是这种“单极”的世界秩序未能持久。当布什总统为显示美国的威力，以不实之词入侵伊拉克时，其效果与他的意图背道而驰。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力一落千丈，结果造成国际金融体系的混乱和国际关系的不稳定。此后终将形成的新的世界秩序，将不会像过去那样受美国的控制和左右。

为了理解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我们需要一个不同于以往所熟悉的理念架构。有效市场假说孤立看待金融市场，完全不考虑政治因素。这是一种曲解。像我已经多次提到过的，在市场的无形之手背后，有一只有形的政治之手，在确定市场运作的规则和条件。我的理念架构关系到政治经济学，而不是概念抽象、受永恒有效规律主宰的市场经济学。我把金融市场看成历史的一个分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建的国际金融体系并没有建立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其倾侧与不平衡是有意设计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是按控股公司的形式组建的，其中富国有不成比例的投票权并且控制其理事会。这使位于该体系边缘的国家相对位于体系中心的国家处于劣势。

该体系从开始建立起就一直受美国控制。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尽管英国的凯恩斯提出了其建议，但是美国代表团团长哈里·怀特提出的计划占了上风。从那时起，我们从几乎全面监管的体系变成了几乎完全无监管的体系；这些变化由美国主导，而且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仍在继续引导这个体系。

尽管由华盛顿共识制定的规则理应对所有国家同样适用，但

美国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发行者，却比别人“更享有平等”。实际上，国际金融体系是一个由两个层级组成的架构：能用自己的货币借贷的国家是该体系的核心，而借贷要由一种硬通货来决定的国家是这个体系的外围。如果某个国家遇到困难，它可以得到援助，但条件很苛刻，这对核心国家和外围国家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核心本身受到了威胁，那么该体系的维持则成为优先考虑的事项。

这种情况在 1982 年的国际银行业危机中第一次发生。如果债务国被允许拖欠还款，银行体系将崩溃。因此国际金融权威机构联手，采用了我当时所称的“合作出借体制”（collective system of lending）。债权国不得不展期贷款（roll over loans），使债务国能得到足够借款支撑债务。最终结果是，债务国陷入严重衰退，拉丁美洲的发展因此被推迟十年，而银行体系得以赢利而摆脱困境。当银行建立了足够的储蓄时，这些贷款则被重新整合为所谓的布雷迪债券（Brady bonds），其余的损失银行也已有能力销账。

1997 年类似情况再度发生，但那时银行已经学会审查贷款，不致被迫采取合作出借的做法，因而绝大部分损失不得不由债务国承担。这样就建立了一个模式：债务国受制于严厉的市场戒律，但如果体系本身受到威胁，规则通常暂停执行——整体失败会使该体系陷入危险的若干银行得到解脱。

2007 ~ 2008 年的金融危机与此不同，因为它起源于核心国，而外围国家是在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才被卷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面对的是一个新的任务——保护因核心国风暴而受影响的外围国。该组织没有足够的资金，但其成员国很快联合行动，募集

了1万亿美元。尽管如此，应对局面还有一定的困难，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设立是为了应对公共领域的问题，而这时信贷的短缺主要影响的是私营领域。但总的来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一新的任务上做得相当出色。

国际金融权威机构应对这次危机的做法，总体上与过去一样：救助将要垮台的金融机构，实行货币及财政刺激措施。但这次危机的规模要大得多，用同样的办法就不见效了。对雷曼兄弟公司的救助失败，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金融市场实际上停止运转，不得不用上人工生命维持器。这意味着政府实际上是被迫在担保，不能让其他可能危及这个体系的机构再垮台。正是此时危机延伸到了外围国，因为这些国家无法提供同样有信誉的保证。这次东欧国家受创最重。处于核心地位的国家，从他们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给这个体系注入资本，为商业银行的债务进行担保，而且政府为刺激经济，使财政赤字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这些措施已见成效，全球经济似乎趋于稳定。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全球金融体系已再次免于崩溃，我们正逐渐回到一切照旧的状态。这是对目前形势的严重误解，已经破碎的东西不可能再回复原样。让我来解释为什么。

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金融市场全球化，是一个以美国 and 英国为首发起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计划。允许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自由移动，难以对其征税或监管，使金融资本处于一种优越的地位。各国政府不得不更多地注意国际资本的要求，而不是本国人民的愿望，因为金融资本可以更自由地移动。这样，全球化

作为一项市场原教旨主义计划，进行得非常成功，使各个国家均难以抵御。但是由此产生的全球金融体系从根本上不稳固，因为它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设基础上，即金融市场可以安全地依赖自身的机制来调节。这正是它崩溃的原因，也是它不可能再复原的原因。

全球性的市场需要全球性的监管，而目前的监管措施都是基于国家主权的原则。也有一些国际协议，其中最著名的是设立了最低资本要求的《巴塞尔协议》，市场监管者之间也有较好的合作。但是监管权威总是主权国家。这意味着，重新启动一个停止了机制于事无补，因而需要创造一个过去未曾存在过的监管机制。目前的情形是，每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是由各个国家自己来维护和支持的。政府主要关注的是本国经济。这会助长“金融保护主义”的倾向，有可能扰乱甚至摧毁全球金融市场。英国的监管部门永远不会再依靠冰岛政府的政策，东欧国家也会对完全依赖外国银行而三思。

我想要说明的是，监管的覆盖范围必须是国际性的。不这样的话，金融市场无法维持全球化，会被独断性的监管毁掉。生意会流向监管气候最温和的国家，这会将其他国家置于无法承受的风险之下。全球化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为它迫使所有国家取消监管，但反之则不可行，让所有国家接受统一监管非常困难。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利益，这促使它们会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

这一点在欧洲可以看到。如果欧洲国家之间都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怎么能让世界其他国家做到呢？在危机期间，欧洲未能达成在全欧洲范围对其金融体系进行担保的共识，因而每个国家不

第五讲 未来的路

得不自保。目前情况下的欧元是一个不完整的货币：它有一个共同的央行，但没有一个共同的财政部，而对银行担保和对其注入资本是财政部的职能。这次危机提供了修补这一缺陷的机会，但是德国成了阻碍。

德国曾是促进欧洲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但那是在其不惜一切代价实现两德统一的时候。当今的德国已非常不同，它和世界其他国家不一样，担心的是通货膨胀而不是衰退。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不想为欧洲其他国家掏腰包。没有了推动力，欧洲的一体化已逐渐陷于停滞。

所幸欧洲有社会安全网络的保障，在情况好的时候，这一保障制度减缓了欧洲的经济增长，经济不好时它则起了作用，使欧洲大陆的衰退没有预期的那么严重。现在随着对经济崩溃的恐惧减退，欧盟正表现出政治复苏的迹象。欧洲中央银行实际上救助了爱尔兰的银行系统，而爱尔兰痛快地加入了《里斯本条约》。不幸的是，欧盟政治上的复苏很可能和经济复苏一样苍白无力。

金融危机对不同国家将产生不同的长远影响，这一事实也可能成为一个问题。在短期内，所有的国家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但是从长远看，有赢家有输家。虽然情况发展的具体过程中变数仍很大，但对地位相对变化的预测则较为肯定。直截了当地说，美国将输得最多，中国则倾向于以最大的赢家姿态出现。这一转变的程度已经超过多数人的预期。其他国家的相对地位也会有相当大的变化，但从全球角度来看，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变化是最重要的。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一直是国际金融体系的中心。

美元是主要的国际货币，美国因此获利甚多，但近来开始滥用其特权。从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日益增长，这种情况本可以无限期地延续下去，因为亚洲“小老虎们”，开始以日本为首，后来是中国，愿意支持这种赤字以加强自己的美元储备。但是美国的家庭欠债过多使这一过程终止。房地产泡沫破灭后，美国的家庭发现自己承担了过多的风险。银行体系遭受极大损失，必须赢利才能摆脱困境。商业地产和杠杆收购流血的时候还在后面。这些因素会继续增加美国经济的负担，美国的消费者将无力再做世界经济的发动机。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有可能取代这个位置。中国一直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而且很大程度上置身于金融危机之外。

总的来说，对西方尤其是美国，危机是内在因素引发的，导致了金融体系的崩溃。对中国来说，金融危机是来自外部的震动，影响了其出口，但其金融、政治和经济制度并未受创。

中国已找到一种极有效的方法，能释放并激发其人民渴望和获取财富的创造性、能动力与创业精神，人民被允许谋求自身的利益。同时国家可以通过维持价值低估的货币和累积贸易顺差，抽取其劳动力剩余价值中相当可观的一部分。因此，中国很可能成为一个大赢家。

中国领导者们知道，如果要保持领导地位，就必须避免社会动荡，所以要尽一切可能保持8%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为不断增长的劳动力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贸易顺差使中国增强了国力。中国可以通过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刺激国内经济，而且可以通过对其贸易伙伴投资和提供信贷增加出口。事实上中国就是这样做的，通过购买美国国债来资助对美国的出口。鉴于现在美国消费者不

第五讲 未来的路

得不减少消费，中国可以发展和其他国家的关系。这样在美国步履维艰地跛行时，中国会成为世界经济的积极推动力量。

当然中国的经济规模比美国小得多，发动机小了，世界经济前行的速度也会慢一些。但在这些局限之下，中美之间的地位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第三方也在积极地重新调整自己的位置。中国已经成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亚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这种位置变化不一定是永久的或不可逆转的——只需想一想日本公司的起落——但在目前，这是全球政治经济中最可预见的也是最重要的趋势。中国正在带动像巴西这样的贸易伙伴，及其他一些非洲和亚洲国家。印度以国内增长为基础，发展得也不错。

中国经济政策的成功不能被当成理所当然的事。对中国内陆基础设施的投资也许产生不了自身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在中国的体制下，新投资的回报一般很慢，因为投资的决策主要是由政治因素而不是商业因素决定的。前两次，银行信贷的宽松造成了一大批不良贷款。这次可能会不同，因为权力在从地方转向中央，地方银行的官员不再受省的领导管辖。但尽管如此，也不能保证一定成功。再有，中国可能被全球的衰退所拖累。但是如果中国出了问题，全球的经济就失去了发动机。因此可以确信，中国会有相对的成功，但不能确保绝对成功。

我们所处的历史时刻，在某种程度上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相似。那时既有体系已经崩溃，一个全新体系有待建立。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战胜国承担起了这个任务。在凯恩斯理念的激励下，它们创立了一个能包容全世界的体系，尽管美国占据了某种特权地位。目前主导的，我们称为“国际资本主义”的多边

体系，还没有彻底垮台，但已大大削弱；它的内在弊病已经暴露，而且受到一个可行的替代方式的挑战。中国的崛起展现了一个与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根本不同的经济组织形式，可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以区别于华盛顿共识下的“国际资本主义”。我们正处于一个时代的终点，但人们还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一点。

两种经济组织形式，国家资本主义与国际资本主义，在互相竞争。两者都缺乏吸引力。华盛顿共识已经失败。目前的国际资本主义已被证明自身存在固有的不稳定性，因为缺乏足够的监管。而且它极不公正，相对穷人穷国而言，这个体系偏袒富人富国。

与此同时，建立在国家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体系，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已初显端倪，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殖民国家已经认识到自己过去的错误并力图纠正时，中国在与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打交道时，又在重复这些殖民国家的错误。为了接近自然资源，中国在与这些国家的政府打交道时忽略了那里的老百姓。这有助于压迫性和腐败的政体维持政权。这样的结果不好，但中国不是唯一对此负有责任的国家。中国一家公司想收购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Unocal）时遭到拒绝。更近些时候，力拓矿业集团（Rio Tinto）反悔了将一部分股份卖给一家中国公司的交易。这促使中国与国际金融机构回避的一些国家进行交易，其中包括缅甸、苏丹、津巴布韦、刚果和安哥拉等国。几内亚是最近的一个例子。这种情况正在成为相当多摩擦的来源，对中国的根本利益并无好处，对全世界也是如此。但中国视自己为受害者而不愿意参加“采掘业透明行动计划”。这已成为该倡议能否继续成功的最大障碍。

在现行的多边体系力图重建的同时，中国会在双边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当然中国也是这个多边体系的一部分，但它在这个体系中所占的地位与它目前的国力不相称；因此它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参与是比较消极的，其积极发展主要是通过双边渠道进行的。例如，中国会抱怨美元的作用，而且会推动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的使用。但中国不可能允许人民币自由兑换，因为这样会摧毁现有机制，即允许国家通过价值低估的货币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中受益。中国会继续实行资本控制，但会与像巴西这样的国家建立以人民币为主的双边结算账户。这样会削弱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但不会取代它。

综上所述，世界面临着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经济组织形式，国际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之间进行选择。前者，以美国为代表，已经垮掉；后者，以中国为代表，正在兴起。我们看到，阻力最小路径（the path of least resistance）导致了国际金融体系逐渐瓦解，而双边关系体系又容易造成国家之间的冲突。所以一个以更健全的原则为基础的新的多边体系亟待建立，它符合美国和中国的最大利益，自然也是整个世界的最大利益。

尽管在监管改革上的国际合作，几乎不可能以零零散散的方式实现，但是有可能通过整体重新安排，调整金融秩序来商定。20 国集团作为国际合作的主要论坛，和在匹兹堡会议上采纳的同行评审程序（peer review process）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步骤。但是 20 国集团必须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的范围内运作，因为修改章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可以一举完成很多任务。它可以重

新构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之能更好地反映国家之间的排序，并且修改现行运作方法。会议也可以决定怎样对待规模太大而不能让其失败的金融机构，以及考虑控制资本流动的新规则。金融资本在国际范围内完全自由地流动，已被证明是不稳定因素的一个来源，需要约束控制。

最重要的是，国际金融体系需要改革。将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已造成了危险的不平衡。美元已失去了它曾拥有的信任和信心，但尚无其他货币可取而代之。现在总的趋势是各种货币正在向黄金、其他商品和有形资产转移。这样是有害的，因为它将这些资产锁住而不能投入有效的使用，并且会煽起对通货膨胀的恐惧。

美国不应该排斥更广泛地使用特别提款权。这可以使国际社会敦促中国放弃将其货币与美元挂钩，也是减少国际不平衡最好的办法。由于特别提款权是由数个国家的货币决定的，没有哪一种货币可享有不公平的优惠特权。

特别提款权中包括的货币范围也必须扩大，其中一些新加的货币（包括人民币），也许是不能完全自由兑换的。这样，美元仍可能重新将自己树立为更可取的储备货币，其前提是美元要得到严格监管。

特别提款权很大的优越性之一，是它允许国际性的信贷创造。在现在这样的时刻，这种做法尤其有用，信贷将被引向最需要的地方。考虑到目前的情况，这将是一个大的改进。这种机制允许不需要额外储备的富国将其配额转让给需要储备的国家，该做法在小范围内已经开始实行了。

如果我们想在解决全球变暖和防止核扩散等问题上也有进展

的话，那么对当前世界秩序的重新调整，也许必须超越金融体系的范畴。这可能需要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成员国的参与。

这一程序需要美国启动，但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应以平等的地位参与。它们是布雷顿森林机构中不积极的成员，而主宰这些机构的国家已不能主宰。新兴国家应该参与新秩序的建立，以确保它们是这一新秩序的积极支持者。

美国为什么应该倡导改革自己一直是主要受益者的体系？因为这一体系以目前的形式不可能维持，美国如果不带头对其进行改造，损失可能会更大。美国在布什执政期间已经失去了很多势力和影响。如果没有具有远见的领导者，美国的相对地位很可能会继续下滑。美国仍然可以对世界起领导作用。它不能再像布什政府企图的那样将其意志强加于人，但它可以领导一种共同的努力，不仅涉及发达国家，也涉及发展中国家。这将以一种可以被接受的形式重新树立美国的领导作用。

既然中国会以赢家的身份从目前的混乱中脱颖而出，那中国为什么应该接受一个新的多边体系呢？答案同样简单。为了继续崛起，中国必须让世界其他国家接受它。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向更加开放的社会方向前进，将个人自由的扩大与法治相结合。鉴于目前军事力量之间的关系，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下中国才能继续崛起，世界各国也才乐于接受中国的崛起。

为了世界的和平，美国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找到自己适当的位置更为重要。一个已经失去政治和经济主宰的衰落的超级大国，仍拥有军事上的绝对优势，这是一种危险的混合。

如我已经指出的，美国的民主正陷入困境。金融危机使不喜欢面对严峻现实的美国人备受煎熬。奥巴马总统采用了“信心增

值”的做法，宣称衰退已得到控制。如果发生再次衰退，美国人会更容易受各种恐怖言论的煽动。如果奥巴马总统失败，下一届政府会极力地制造事端，转移人们对国内问题的注意，这对世界将是非常危险的。

奥巴马总统的思路是正确的，但他需要看得更远。他相信国际合作，而不是像布什和切尼那样信奉强权就是真理。但是他有很多急迫的问题需要考虑，重建国际金融体系在他的日程表上并不靠前。他的一些经济顾问们似乎仍然相信有效市场假说是正确的，认为一百年可能只有一次不灵。幸存下来的金融机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竞争力，必将抵制会限制它们权力的系统性全面调整。目前缺乏的是一种普遍的认同，即体系已经崩溃，需要重建。因此，我在这些讲座中阐明的有关金融市场的理论应该被更多的人接受，这非常重要。

中国领导人需要比奥巴马总统更有远见卓识。他们是在掌舵，而且如果向更开放的社会迈进，他们必须放弃一些已有的特权。现在中国人还愿意让个人的自由服从于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但不可能永远这样。腐败是一个大问题，中国需要法治，这样公民可以批评政府，防止其滥用权力。

为了使自己被世界所接受，中国也需要成为一个更开放的社会。世界其他国家绝不会让个人的自由服从于中国的繁荣。随着中国逐步成为世界的领导者，它必须学会更多地注意世界其他国家的看法和意见。但是所有这些变化也许发生得太快，中国领导人还来不及调整自己。希望中国的领导人能够承担起历史的重任。毫不夸张地说，世界的未来要看他们怎么做。

THE SOROS LECTURES

上架建议 ④ 经济·金融

ISBN 978-7-5086-1888-3



9 787508 618883 >

www.publish.citic.com

定价：28.00元